

破壳飞腾——倪柝声的被困与锐变(吴秀良)

目录:

序言 倪柝声的两个影像

前言 倪柝声和中共五〇年代的整肃运动

倪柝声二十年监禁时期大事记

第一部 提篮桥监狱的「服刑改造」

第1章 被捕和预审

第2章 看守所的折磨

第3章 提篮桥监狱面面观

第4章 接见探监的家属

第5章 「八年」？还是「枪毙」？

第6章 倪柝声的同监犯

第7章 倪妻张品蕙的遭遇

第8章 全监的批判大会

第9章 瓦屋湾监狱里的「花岗岩」

第二部 白茅岭农场的「劳动改造」

第10章 白茅岭农场概况

第11章 副业队的陶珠莉

第12章 难友何奇又相逢！

第13章 心脏病发了

第14章 丧妻之痛

第15章 幽谷中的哀鸣

第16章 「我因信基督而死」

后记 蜕变的倪柝声

附录

1 「我是怎样转过来的？」——倪柝声

2 倪氏同监犯陶珠莉单纯信心的能力

3 倪氏同监犯吴友琦受洗归主

4 倪妻张品蕙的「平反」书

5 倪妻张品蕙临终前的亲笔信

6 倪氏临终前致张品琤、马兴涛亲笔信

序言 倪柝声的两个影像

这是一本关乎倪柝声晚年被囚生涯的书。在读者开始阅读本书以前，笔者愿意先来讨论一下我们对于一个被神大用的器皿及其「所是」和「所行」应有的态度。

新约的「使徒行传」是记载「使徒们」在地上肉身生活里重要「行动」的「传记」。它给我们树立了为神的仆人们作传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不要把他们塑造成一个「完人」，而应当把他们看作和我们同有血肉之体的人。在行传里，保罗亲密的同工路加对保罗的刚强见证固然予以忠实记载，但是对于保罗的失败和软弱也绝不蓄意隐蔽（比较徒九 22-25 和林后十一 30-33）。当保罗软弱到一个地步竟然违背了他所看见的属天异象而到圣殿去献祭时，这样离谱的行动路加也照事直书（见徒廿一章）。保罗自己也作见证说，他的软弱，没有让他灰心，反而使他更多经历神的「恩典」和神的大能，更使神的能力在他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林后十一 9）。

不但如此，神就是使用了这个「并非完人」的保罗，好将祂历代以来隐藏的奥秘和在基督里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教会。每当我们读到保罗的书信时，我们就似乎是接触到另外一个保罗，是一个由属天启示和异象所构成的保罗。

这两个保罗，一个是肉身的，一个是启示的。我们每当读到那个软弱的保罗时，我们就应当受到鼓励说：「啊！连这么属灵的保罗，有时也会软弱；何况是我们呢？」（请注意：「软弱」和「犯罪」不同。圣灵体贴并帮助我们的「软弱」，但不能帮助我们「犯罪」，参罗八 26）。我们应当向保罗学习，不倚靠自己而倚靠神。当我们接触到那个「启示」的保罗时，我们就更能进入他所得到的属天启示和亮光，引领我们奔走属天的路程。所以我们如果知道如何对待被神大用的器皿，这两个不同的保罗都应当对我们产生正面而属灵的影响。

本书就是在这个观点中来看倪柝声晚年二十年被囚的历史。在看完肉身的倪柝声以后，我们也要对启示的倪柝声加以评价。

关于史料方面，笔者所采用的是多方面的：第一种是笔者对倪氏夫妇家族们的访问记录和倪氏写给他亲属的亲笔信函。第二类是笔者对一位倪氏同监犯人的录音访问（名叫吴友琦）。第三类是笔者对数位在同样被囚环境中度过劳改生涯的信徒犯人或家属的访问。其中有两位是受到倪柝声案件牵连而被捕的。第四类是关于倪氏被囚监狱和农场的组织和运作的资料。最后一类是中共官方的资料和非信徒犯人的记录。笔者对这些资料均曾加以慎重的处理。

本书绝不是一部描述倪柝声劳改生涯的详尽记述，而是笔者利用这些史料重建出倪氏二十年被囚生涯的「剪影」。现在我就先请倪柝声的一位外甥女为我们揭开这个剪影的序幕。

前言

倪柝声和中共五〇年代的整肃运动

倪柝声的外甥女张佩心（其妹倪德诚之女）于一九九三年十月九日写给亲友们的信中说：「这四十

多年来对于大陆的基督徒特别是倪柝声的家族是一场严重的试炼。回想起大舅妈（倪妻张品蕙）身上鞭痕累累，连眼镜都没有完整的一副。病重不准收进病房，是在中山医院走廊上离世的。死后连抬尸体的工友都不来。」

张佩心的信中也透露了他二姨妈（倪的二姊倪闰贞，林步基夫人）如何被斗到死的情形：「当她病重极其虚弱之时已无法走路，就坐在藤椅上任人抬到大门外弄堂里惨遭斗争到死。死后不准在殡仪馆的礼堂里开追思会。尸体直接送到焚化炉火化。除儿女外不准任何人参加。」

信中也提到她二舅倪怀祖（中国生物化学制药厂的创建人）：「他因为是倪柝声的胞弟也被斗得很惨。红卫兵要他弯腰、手向下垂，不准动有九小时之久。所以他曾软弱过；曾在台上公开宣称放弃信仰（不过感谢主后来他又恢复信仰，且是信主而终）。」

张佩心只是列举了倪柝声家族遭受严重试炼的例子。但是大陆的基督徒在中共极左派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年）所遭受到的试炼更是罄竹难书！毛泽东于一九七六年去世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得以逐渐贯彻推行。因此许多经过「火炼的试验」（彼前四 12）而存活下来的信徒才能享受较多的自由。有的留在国内继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有的得以出国与亲属团聚而在异乡继续忠心事主。

有关他们遭受试炼期间的苦难经历，有些已经刊印成书，其中汪纯懿的《何等奇妙》对于她在提篮桥监狱和白茅岭农场的劳改生活提供了详细并扣人心弦的描述。汪的被困纯粹是因着翻译西方著名的属灵书籍所致。青年医生陶珠莉（笔者按：珠莉为其英文名，其原名为约琳。）的被困乃是因为受到张愚之案件的牵连（张愚之是倪柝声被捕后，上海地方教会里最受尊敬的领头同工。）张愚之与陶珠莉二人的珍贵经历至今还只在少数信徒中间流传着。

至于有关倪柝声本人二十年之久的被困经历，迄今在世界上的信徒中间也只有一些传闻。本书希望利用可靠的史料对倪柝声晚年被困的空白加以充实，但是由于倪柝声的被定罪不只是个人的事，而是被定罪为一个「集团」的首领。因此张愚之和陶珠莉的经历也就必须同时穿插在本书所叙述的倪柝声的故事里。

这些信徒犯人都是上海被捕的。因此就都被关在「上海市监狱」，俗称的「提篮桥监狱」里服刑。刑满后被转到安徽的白茅岭劳改农场继续劳动改造。因此这两个场所就成为他们生活的共同点。本书在叙述这些信徒劳改犯们的「经历」时，也同时对这两个重要的劳改「场所」的组织和其运作方式加以有系统的分析。因为它们与每一个被困犯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对于倪柝声来说，他的厄运源自中共五〇年代的宗教政策和其一连串的整肃运动。中国大陆政权易手前，国内宗教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中，天主教里首推龚品梅，而基督教里首推倪柝声。那时倪除了「传道人」的身份外，还兼俱「资本家」的身份。「解放」初期，倪是当时四百多个「地方教会」（俗称「基督徒聚会处」）的属灵领袖。当西教士于一九五二年撤离中国后，人数众多的「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信徒大部分与「地方教会」合并，因此在倪领导下的基督徒人数就居于全国第一位。他若不能配合政府的宗教政策，自然就产生了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他的「资本家」身份也必然要受到中共经济政策的影响而成为政府整肃的对象。

倪柝声对他所面临的险境曾经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变措施。在宗教信仰方面，倪氏是在不违反圣经

教训的原则下，试图和政府配合。一九五〇年底，他公开拥护「三自革新宣言」。一九五一年四月，他到北京参加了国务院召开的「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徒团体会议」（简称「北京会议」）后，同年八月二十日在一次由他在上海地方教会里亲自带领的「政治学习」中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题目是「我是怎样转过来的」。当时对他思想影响最大的当属他的亲戚张汝励（倪妻张品蕙的六叔）。

但是当中共于一九五一年底发动了激烈的「五反」运动时，他就象其他的「资本家」一样遭殃了。「五反」运动以前倪氏已经把他上海的「生化药厂」卖给沈阳一个国营的「东北药厂」。另外，他又在上海成立了几个新的企业，包括「弟兄药厂」和「翠华染料厂」等名号。当「五反检查队」在「东北药厂」发动该厂工人揭发雇主的「五毒罪行」时，倪氏就被某些原来在上海「生化」工作，而以后被转到「东北药厂」来的工人揭发了。因此东北公安部派人到上海，在一九五二年的四月十日「请」倪氏去沈阳「交待」被控罪状。而他就是在前往沈阳的火车上正式被逮捕的。

倪氏在沈阳受审定罪后，旋于一九五三年初被押回上海。在那里他被关押在「上海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继续接受审查其「经济犯罪」以外的「重大罪行」。同年六月上海市公安局举办「反动会道门罪证展览会」（打击对象以一贯道、九宫道、同善社等九个道门为主。）在展览馆的后面也附设了一个房间专门陈设龚品梅和倪柝声的罪证。吴友琦当时正在念中学，他由校方带领参观了展览，因此心里就对倪柝声产生了先入为主的不良印象。

一九五六年一月三十日倪氏以所谓「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首领身份被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正式「提起公诉」。时年五十四岁。起诉书中列举了倪氏涉嫌犯了「经济」、「政治」和「军事」（情报）等「反革命罪行」。同年六月廿一日，上海市中级法院正式对倪氏公开审判（全部审判过程只有数小时）。当天有数十位上海市基督教界著名人士被邀参加旁听，也包括当时上海地方教会的两名男女代表（张锡康和徐梅骊）。法院「依法判处倪柝声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倪氏曾上诉到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上诉被驳回，维持原判。从此他就由「第一看守所」转到提篮桥监狱服刑，并接受「劳动改造」。

关于倪柝声被控的罪状，上海市检查院的起诉书附有二千多页的「人证」和「物证」。这些档案迄今尚未正式对外公开以供史家予以客观鉴定其真实性。鉴于中共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史实的处理方式，其中夸大不实之处势恐难免。

倪柝声在上海市提篮桥监狱服刑十五年期满后（一九六七），又在「青东」和「白茅岭」劳改农场继续改造将近五年之久。外界对于倪氏二十年的被囚生涯多有传闻，但是确实信息却极其稀少。本书所引用的资料都是来自笔者十数年来研究所得和与倪氏家族亲戚以及和他同囚之人的访问记录。读者会发现，在下面所述故事里你听不见倪柝声自己的声音。一切有关他劳改生涯的事都是出自别人的口（主要采自一度和他同监难友吴友琦的见证）。这是本书无可避免的局限性。

下面的年表是倪柝声长期被囚的一个大事记，它与当时中共震荡的政局有密切的关联。因此在进入本文之前，这个年表可以为读者提供一个简明的导向。

倪柝声二十年监禁时期大事记

时 间	政 情	事 件
1952 年 4 月 10 日		在「五反运动」中，倪柝声在前往沈阳的火车上被东北公安部人员正式逮捕。
1952 年 7 月		上海「生化药厂」进行「五反」运动。「生化」财务部审核主任张锡康因抗拒交代倪氏「盗窃国家资财」罪行（「五反」时「五毒」之一），被判三年有期徒刑，在提篮桥监狱服刑。
1953 年初		倪氏被押回上海关在「上海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继续审查。同年 6 月，上海市公安局举办「反动会道门展览会」。展览馆后面附设「倪柝声和龚品梅反革命罪证」展览室。
1956 年 1 月 29 日		上海公安局当日夜间同时逮捕所谓「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首要份子张愚之、李渊如、汪佩真、蓝志一和在「上海基督徒聚会处」聚会的领头人物。同年倪妻张品蕙被关在提篮桥监狱（1957 年释放回家接受「监督劳动」）。
1956 年 1 月 30 日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正式向中级人民法院对倪氏「反革命罪行」提起公诉，附有「罪证」卷宗 2292 页及各种「物证」。
1956 年 2 月 1 日		上海「解放日报」和「新闻报」刊登「破获隐藏在“上海基督徒聚会处”内的倪柝声反革命集团」；转载于 2 月 6 日「福建日报」。
1956 年 4 月 15 日		「上海基督徒聚会处」加入「三自革新运动」。
1956 年 6 月 21 日		倪氏在「上海中级人民法院」受审，上海教会派张锡康(男)和许梅骊(女)参加听证。倪被判「十五年徒刑，剥夺公民权五年」，刑期追溯到 1952 年 4 月 10 日被逮捕时算起，倪氏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1957 年 1 月 28 日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理倪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倪被移到「提篮桥监狱」服刑。

1957 初		倪妻张品蕙从提篮桥监狱被释放回家。
1957 (至 1965)		倪氏在提篮桥监狱从事「脑力」劳动，替政府翻译西方科技和医学书报资料。因改造表现良好，被监方指派为政治学习「小组长」。
1960 年至 1965 年	中共中央在刘少奇和邓小平 主政期间采取务实温和路线	
1961		倪妻获准每月一次到提篮桥监狱探望倪氏。
1965		同监青年犯人吴友琦调房与倪氏同室。
1966 中	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简称「文革」)。	
1966 年 11 月		吴友琦从提篮桥监狱转移到白茅岭劳改农场的「瓦屋湾监狱」继续服刑。1967 年夏初服刑期满。被派到深山区的「杨村」伐木：旋即转到「枫树岭副业队」劳动。
1967 年 4 月		倪柝声十五年监狱服刑期满，转到上海郊区的「青东农场」劳动改造。据说他因对「场长」传福音，被同作「场员」的小流氓毒打。
1968 年 5 月	「恐怖五月」：邓小平子女被 关押审查，同年 8 月邓朴方 跳楼抗议，脊骨断裂，生命 垂危（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 文革岁月》， 页 96-97）。	
1968 年 10 月	邓小平被撤除一切党政职 务，保留党籍（邓榕，页 105）	
1968 年 11 月	刘少奇被撤除一切党政职 务，并于监禁。	
1969 年 2 月		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以张品蕙「思想反动， 利用宗教进行反革命活动」等罪行给她戴上 「反革命份子帽子」，交人民监督改造。
1969 年 3 月	中苏在东北边界武装冲突— 「珍宝岛」事件。	
1969 年 4 月	中共第九届党大会，林彪明	

	定为毛泽东法定继承人。	
1969 年底		倪柝声被移送到安徽北部的「白茅岭农场」下的「枫树岭副业队」，被分发到吴友琦的生产小组劳动。二人在同一宿舍，邻床而睡。
1970 年 4 月 25 日		张愚之、陆道雄在上海万人大会上公审后判处死刑，当日立即执行。他们被押赴刑场枪决前被绑在刑车上游街示众。目睹者见证二人「面上发光，从容殉道」。张氏在刑场就刑前仍然「欢乐唱诗赞美神」。
1971 年 9 月 13 日	林彪政变暴露，在逃往苏联时飞机坠毁外蒙古。	
1971 年 9 月 19、26 日		倪氏于 19 和 26 日两次写信要张品蕙到白茅岭农场看他，因他「病在广德农场」。
1971 年 10 月 26 日		张品蕙从桌上摔下，折断肋骨住院就医。张品琤及孙女于 1971 年 10 月 27 日到达上海照顾她。
1971 年 11 月 7 日		张品蕙心脏病发死亡。
1971 年 12 月 16 日		倪致张品琤信，要张品蕙贴身旧衣物。
1972 年 1 月 9 日		倪致张品琤和鲍贤玲信要亡妻「病历卡」及「死亡证」。
1972 年 2 月	美国总统尼克森访华，在上海发表中美「上海公报」。	
1972 年 4 月 10 日		倪二十年刑满可以离场释放，但不准到上海或北京，只准到乡下去，倪苦于无亲属接纳。
1972 年 5 月 6 日		因次日是倪妻张品蕙逝世半周年。倪写信给张品琤盼她来再见一次面，因他「病已缠绵，（心脏病）经常反复。」并询问侄女婿马兴涛浙江乡下住址。
1972 年 5 月 22 日		倪写信给马兴涛恳求他收留并向公社申请证明。当日和农场领导谈出场事。

1972年 5月25日		倪被迁移到「山下铺」(白云山)分场残老队「修(休)养组」。
1972年 5月30日		倪写信给张品琤,请她「不必来了。」虽预感要死,但「病中心仍喜乐」。
1972年 5月31日		清晨二时,倪「病故山下铺!」。

第一部

提篮桥监狱内的「服刑改造」

一九五六年倪柝声以所谓的「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首脑身份被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判刑十五年后,由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移解市「提篮桥监狱」服刑改造。时年五十四岁的倪柝声,就此开始了他漫长的牢狱生涯……。

第1章 被捕和预审

在中国,一般逮捕嫌犯的时间永远是在夜间。沈立行被捕的经历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是一九五五年初春,「因为一件冤案株连而被捕。」他描述说:

「那是元宵节后的晚上,漫漫长夜,春雪纷飞。我刚从弄口小店买了香烟,正点燃一支香烟的时候,身边来了两个穿雨衣的人,问了我的姓名,就颇为客气地将我『请』到路对面的吉普车上了。我坐在后座中间,那穿雨衣的人打开手电筒,给我一张小小的字条,低声说:『你被捕了!这是逮捕证。自重一点,我们不上铐。』」

被捕时一般涉及嫌犯居住地的三个部门:第一,居民委员会(街道委员会)主任;第二,派出所的户籍警;和第三,公安局的员警(民警)。或上钢铐或免上,但一般都要在逮捕证上签字。被捕后的第一站是公安局的「看守所」或分局的「拘留所」。沈立行说:「车辆南行,我知道是去南车站路看守所,这是一块凶地!一路如坐针毡,内心忐忑,到了看守所,果然受到一场不平常的接待:衣袋里的东西统统被掏出来;裤带被迫抽掉,大约是防我上吊自杀……然后,他们就让我盖了手印,这手印是十个指头全要盖的。犯人为这起了个雅号『弹钢琴』。盖完手印,对我来说,已是『换了人间』,从此进入另一个世界了。我两手拎着裤子,跟着员警走过阴暗的走廊,进了牢房。」

汪纯懿的被捕是有预感的。她说:「一九六二年七月二日晚上七点多钟,居民委员会的主任,派出所户籍警、公安局的员警一起涌进了我的会客室。那天空中掌握者的首领——撒旦,忽然在我面前放出一道亮光,又对我说:『到香港去。』后来,公安局的员警将我的双手用钢铐铐了起来,将正式逮捕证拿出来叫我签字,将书柜的书籍一本本都扔到地上,扔完了书就搜查我的译稿。然后将我所有译的手稿以及所写的《起来祷告》都搜了去。那时与我生活在一起的黄姊妹,在自己房内不住的流泪。我

告诉居民委员会主任，请黄姊妹到会客室来，我可以交给她一些钱，并将一只小钟交给她。那时有个公安员警不同意我将小钟交给她。我就告诉他们：『她没有手表』。他们才答应。我又交给她一些鸡蛋和其他食物，这是神为她预备的；因为春节前她回抗州去过春节时，我将分配给我们的副食品都给另一位（姜姓姊妹）吃了，她回来时就没有什么可吃的。这次神补还给她。从这件小事上，也可以见到神的公义。

「那时我想自己会死在监狱里。走的时候，我要带一本小圣经到拘留所去。当晚九点多，我被带到虹口公安分局。一到分局就打手印，全身被搜查，以后就睡在一间小屋的地上了。关在小屋内的都是一些扒手、小偷、娼妓、投机倒把的青年。于是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对他们传讲福音，教他们唱赞美诗。两三天后，拘留所所长就来训话了，她不许我传福音。但是我仍可以用祷告来事奉主、赞美主。祂还是照着祂的信实看顾了我。」

吴友琦的被捕是这样。他说：「有一天，我从学校回来。大概八、九点钟左右，忽然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原来是那个户籍警和一个员警。他们进门以后就出示逮捕证，要我跟他们到分局去。因为分局离我家不远，并且逮捕的时候并没有给我上手铐。所以我就步行跟着他们去了。我那焦急万分的母亲也跟着我们一路走到分局。一直等到我被关押起来以后，她才流着泪回家去了。我经过搜身和盖手印的例行手续后就被关进拘留所的牢房。」

有的犯人是在自己的单位接受「隔离审查」后才正式被逮捕。陶珠莉就是这样。不论怎样，他们进入看守所以后都需接受提审。期间都经过不同程度的折磨。

第2章 看守所的折磨

上海市关押犯人的场所分两类：凡是等候法院判决的，不是关在各区公安分局的拘留所就是关在公安总局的看守所：位于南车站路的是「第一看守所」（在这里关过的有沈立行、倪栢声、张愚之）；位于建国西路（马思南路）的是「第二看守所」，汪纯懿在这里关过。看守所的条件比拘留所好。汪纯懿是先关在虹口区分局的拘留所，以后转到第二看守所。沈立行和倪栢声都是一开始就关在第一看守所。吴友琦一直是关在南市拘留所。

恶劣的环境

被关押期间的犯人在监房里应当遵守「监规纪律」：不许交头接耳，谈天说地。但事实上犯人并不遵守，只要员警不来，大家在一起混熟了，闷得发慌时，总是要聊天的。「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都可以大谈特谈。「谈的最多的是春夏秋冬、子女老婆、风花雪月、花鸟虫鱼。」但是「各人的案情和反动言论是不谈的，或者说不敢谈的，谈这些玩意，每个犯人都知道它的后果和份量。」

有的犯人心里想得开，是乐天派，就随遇而安地去适应监房的生活。沈立行就是这样：他「每天早晨，铺床迭被，堆成『沙发』；擦清地板；将马桶抬出去；接进热的洗脸水和早饭……出去放风，晒晒太阳……和周围的监友熟了，就聊开了天……安安生生地在这个小天地里落户了。」

有些基督徒犯人，他们凭着信仰的力量，得以克服监所的恶劣环境。汪纯懿一九六二年夏天被捕，

关在虹口分局的拘留所。那时正值盛夏季节，她说：「几十个人拥挤在一个极小的房间里，只有一个极小的出气洞，里面装着一只极小的鼓风机。天气非常闷热，以致我透不过气来，加上我的心脏又有疾病，似乎不能生存下去了。那时神感动我用一块小毛巾，放在流入便池的自来水里，使毛巾浸湿了再用它放在额上和鼻孔里。这样，觉得神智清爽不少。」她靠着不住祈祷的力量来适应监房的环境。

吴友琦的情况稍有不同。那时他既没有沈立行的乐观思想，也没有汪纯懿的信心力量，因此，他虽然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竟然因为气愤和忧郁，而患上第三期肺病，几乎丧命。他说：

「坐监以后，一天只有两顿饭。早上六时起床，洗漱后整理好床铺，然后就坐在地上开始『思想改造』。在监房里不许闲谈乱道，只能坐在自己用铺盖迭成的『沙发』上，『静思己过』『考虑问题』，为了帮助自己能够写好『自传』和『彻底交待罪行』。一直『反省』到十点钟才吃早饭。一般早餐是非常稀的稀饭，没有多少米在里面。当然是吃不饱的。一直到下午五点钟才能吃第二顿饭。还是每人给一个圆铅铜罐，米饭占罐高的三分之一，上面有些茄子（没有油，水煮的）。天天吃茄子，很少换样。一直到现在我都怕看见茄子，更不想吃了，因为我一看见茄子就想起那一段痛苦的往事。我本来是个运动员，体力消耗很大。现在一下子每天饿得要死，如何受得了呢？因此我的体力急剧下滑。加上思想实在想不通，总觉得我是个青年有为的人，我的黄金时代都被他们糟蹋了。我越想越难过，后来我就病了。」

他是因为病得相当严重，就被送到提篮桥医院去。一个月后，就提前送到法院判刑。判决书列举了他「思想反动，污蔑攻击三面红旗」等罪名而判他七年徒刑。但判决书最后准他「保外就医」，就是在家一边养病、一边服刑。

严酷的预审

进到看守所以后最难熬的一关是「预审」。为了逼使嫌犯坦白交待，监方常以严酷的手段折磨他们。根据陶珠莉的见证，她说：

「我一九六九年在医院被抓时，我刚结婚生了第一个孩子。他们用孩子要胁我，言明我若写一页材料他们就让我看一次孩子。这个诱惑实在很大。我实在想看看我的小陶陶，那时他才十四个月。我实在想写，但是还是没写，只写了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他们说没实质，不行。有一次他们把孩子抱过来给我看看，孩子实在是可爱，我真想回家看他。

「但里面有一个感觉提醒我：不可为看孩子而出卖弟兄。最后他们就把我转到第一看守所去审讯。在这里可不像在医院那样客气了。我不写，他们就把我的手反铐起来，一铐就是四十天，铐链嵌到肉里直到现在手腕上还有手铐的印子。铐了四十天之久，昼夜都不给我松铐。两手又酸又痛。我开始就想不吃不喝，真想饿死算了。

「有一天我痛得受不了时就向主说：『主啊！求祢像祢对保罗一样行个神迹，让我的手铐开一会我就满意了。』我祷告以后链子真的开了。第二天他们来看，才发现原来是手铐的钉子生锈裂开了。就给我换了一副大手铐。大手铐宽度较大，我的手舒服多了。我就感谢主：『主啊！谢谢祢！』过了许久，才对我判刑。判决书说我是：『顽固不化，死不悔改。』」

吴友琦从一九六〇年在看守所被关了大约一年。以后在家里「保外就医」二年多。到了一九六三

年，母亲过世，因此就无人「保」他，同时政府认为他身体已经好了，就又将他提到提篮桥监狱去服刑。吴友琦和倪柝声第一次碰面是在一九六五年，那是他进提篮桥监狱一年多以后的事。现在我们把镜头转向中国这个最大的监狱里。

第3章 提篮桥监狱面面观

建置和运作

提篮桥监狱是「上海市监狱」的俗称。它的建置可以追溯到一九〇三年。当时英国人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华德路建造了一座监狱。该地处于提篮桥区，故俗称之为「提篮桥西牢」，是用来囚禁犯有重罪的华人，和在华没有驻有领事国侨民罪犯的地方。当初该监占地约十余亩。监房多达 510 间，其中 30 间专用于囚禁少年犯，称为「感化院」。另外，还设有囚禁精神病犯的特殊牢房，四壁是橡皮作的，内装弹簧，以防犯人自杀，故有「橡皮牢」之称，可说是「狱中之狱」。解放后，则用来监禁不服改造的犯人（如汪纯懿等），据说现在已经不用了。

解放前提篮桥的监房大楼按着忠、孝、仁、爱来划分，所有汉奸都关在「忠」字间（大讽刺！）。解放后该监占地扩大，由十座大楼构成，以号码命名为一号楼、二号楼，一直到九号。一到九号楼都是监房，应在二、三千间上下；而十号楼是监狱医院，它和监楼中间有高耸的篱墙隔开。监牢的前后门都是大铁栅。从前门进去要经过三道铁门才能到达一个个耸立的监牢大楼。各大楼中间有相当的空间距离，但是树木比较稀少。监牢里被囚的犯人至少有万人以上。

监狱的场地上设有各种类型的工厂，如被服厂、印刷厂、仪表厂。女犯多半在服装厂（兼作布制的洋娃娃等）。有些工厂设有「翻译科」，外文好的犯人就分派到这里翻译外文科技和医学资料，据说倪柝声在六〇年代初期就被分派在这种地方从事翻译外文书刊的脑力「劳动」。监房大楼中间的空地是为犯人每天出来「放风」（散步）用的。夏天也用来让犯人坐在地上看京剧或听评弹的演出。

提篮桥监狱内的十座大楼，都是五层高的，楼与楼中间有小铁轨相联，是用来将厨房的饭食运到各监房，监狱大门口和大墙四周的碉堡内有荷枪实弹的解放军站岗。监狱里还有一个犯人的商店开在三号监的底层，服务员和顾客都是犯人，另外还有一个大礼堂用来开各种大会和每月犯人家属探监时「接见」之用。

基督徒犯人算是「反革命份子」，属政治犯所以要关在三号楼。那里的犯人包括国民党特务和各种刑事犯（小偷、妓女，和杀人犯等）。关在一号楼里的是二十年以上到无期徒刑的重刑犯。天主教的主教龚品梅和抗战时伪政府主席汪精卫的太太陈碧君都曾关在这里。二号楼关的是抢劫、窃盗等较轻的刑事犯。八号楼是病尚不太严重，正在养病的犯人住的。女犯们通常关在九号楼（象陶珠莉、汪纯懿、汪佩真和李渊如等）。女监和男监完全分开。

政治学习场所

每个监房面积大约十尺长、四尺半宽。牢房的大小象一个工厂里用来搬运货品的大电梯间。一间监房一般是挤三个人，人多时可以挤上四五个人，那样大家的身体就无法平躺。牢房的顶头还放一个

小马桶。(改革开放后的条件肯定改善了,可能也有抽水马桶了)。各栋楼间有一大块空地,铺设铁路一样的小轨道,以便将伙食利用轨道推到各监楼。饭盒都放在一格格的车上推进每个监房。每层楼的走廊二百尺长,上面有铁轨经过牢房门口。

每栋楼有五层,每一层有几十间牢房。几个牢房的犯人就近组成一个「小组」作为「政治学习」的单位。牢房中最恼人的就是放在顶头的小马桶,它是用木板拼造的,外面用铁条固定。但因年长日久铁条生锈氧化,一旦崩断,马桶中的大小便就都流到牢房的地上。犯人的铺盖,来不及抢救,就被大小便弄得又脏又臭。只有在这样情况下狱方才会给他们换一个新马桶。

大楼里的牢房都用编号分别。前面铁栅面对大楼的走廊。犯人可以从铁栅伸出手去拿「洋铜罐」和热水缸。监房的地面是用一种特殊的水泥铺平的,冬春季节,寒气袭人。犯人必须自备较厚的棉被铺在地上御寒,另外还要自备毛巾和日用品。犯人没有凳子,只能用自己的衣服或购买大量草纸迭成「小凳」,坐在上面学习。

炊场规模

监狱的大伙房也叫「炊场」,专责供应全监犯人的饭食。这个特大的「炊场」一次可以供应上万人的伙食。煮粥烧饭,都是用如同青石水缸那么大的压力锅,共有好几十只。一通蒸气,很快就生米煮成熟饭。开饭时,「洋铜罐」热气腾腾,一只只打满菜饭,就放在一个大木格子里,在小铁轨上推送到各监房去。什么叫「洋铜罐」呢?就是铝皮制造的长圆饭盒。除铁轨推送外,还叫犯人背。一木格要放三四十只「洋铜罐」,一百多斤,堆在背上,背的人的腰要弯到几乎90度。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要身强力壮的人才能胜任。

沈立行对提篮桥每天「开饭」时的盛况也有生动的描述:

「每逢开饭,各监房的劳役犯将一只只『洋铜罐』送到牢房门口的铁栏杆外;另外有一名劳役犯核对着数字,高声喊着:『三两两只、四两一只……』活像选举时的唱票。犯人伸手,将洋铜罐拿进监房,于是『进膳』。发饭的时候,同时也发开水,如果家属送有茶叶,则香茗一杯,也未曾不可办到。一个监房,几百上千的人同时吃饭,那筷子和调羹撞击洋铜罐的声音,汇集拢来,就是一首音量极大的超现代派乐章。」

根据劳改法的规定,犯人伙食应当维持一定标准。菜单是由专门负责营养的医生安排批准供应。一般每星期均有三、四次有肉可吃。但从一九五七年反右开始,接着又是「三年自然灾害」(一九六〇~一九六三年)一共有六年之久,其间伙食非常差。国民经济恢复期的三年中间(一九六三~一九六六年)开始有所改善。接着又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年)其间犯人只能吃「麦皮、稀饭」一类的粗食。虽然维生素相当丰富,但是不能解饿!

负责给犯人送饭的是「劳役犯」。他们多是年壮力强才被监长分配这种劳力工作。他们的责任还包括替犯人洗衣服、倒马桶、发开水和背「饭格」。总之他们等于「承包」了犯人们全部生活劳务。有的时候,犯人因为「反改造」也会被派做倒马桶的工作,以示惩罚。(汪纯懿就是因坚持「谢饭」祷告而受到这种待遇。)

淋浴哲学

「吃、喝、拉、撒、睡」五种身体的基本需要，都是在牢房里解决，只有理发和洗澡需要到外面。根据规定，犯人们七天洗一次澡，半个月剃一次头。但是即使是剃头这样的小事也和「思想改造」脱不开关系：剃头一般都准许留头发，不剃光头。但这只是对那些服从改造的人讲的，对于一些「反改造」和「二进宫」的犯人就会勒令剃光头，这是一种标记，防止逃跑。犯人每次理发后，自己洗头、修脸，刮得干干净净，自然会觉得精神焕发，心情舒畅。在这样日常生活的琐事上，或留发或光头都蕴含着深奥的「犯人心理学」原则。

男监犯人洗澡的地方是一个异常广大的淋浴室，设在监狱炊场的楼上。其中装着一排排淋浴喷头。浴室外面的换衣间设有层层木架，以供堆放衣物用。每逢洗澡的日子，浴室大门打开，犯人们一涌而入，各自抢占蓬头的位置，平均二、三人一个。这一排排淋浴器的总开关是由一个人坐在三、四米高的木凳上负责操纵，哨子一响，放水了，当然是热水，但只有几分钟，让大家湿了身体，可擦肥皂。过一会，又开龙头，白花花的热水直喷下来，每个人动作要敏捷，手脚并用就象电影中的快镜头那样，在三、四分钟内冲洗完毕……

女监方面没有男监那样轻松。女犯们每次洗澡就象战场上冲敌陷阵一样。根据汪纯懿的记载：

「犯人们一听见『洗澡』二字，立即将藏在棉被包或箱里的干净衣服拿出，还将肥皂毛巾等物带到浴室。一边奔走，一边将内衣纽扣解开，这样可以节省时间。在更衣室迅速脱去衣服，跑进淋浴室。许多人挤在一起，用肥皂擦洗，洗了几分钟，即刻穿上衣服，纽扣还来不及扣好，大家又匆忙地排队回监房去了。遇到寒风袭击时，刚从浴室出来，头发上就结了一层薄冰。」

犯人的日常生活方面还有「放风」的规定（集体到楼下院子里去散步）。彼此相识的信徒也会在放风时相遇。但是只能以眼目和身体语言表达欣喜和彼此的鼓励。监方逢年过节也会放映电影（宣传性多），或让犯人组织京剧演出，演员中不少是近乎专业的人才。追求灵性长进的信徒一般宁肯操练与神交通默祷，尽量不去参与这种娱乐。

医疗设备

提篮桥医院设在监狱里面的第十号楼。其中条件比较好，也很宽敞，和外面的医院一样，只是不许外边人进去。至于护士和医生，他们都很细心给病人治疗，跟外面医院的医护水准不相上下。

这是一所现代化的医院，除了门，窗上到处装有阴森的铁栅外，再看不出和其他大医院有什么不同的地方。这里除没有挂号处，一应俱全：门诊部、化验室、X光科、理疗科、手术室、住院部、药房，还设有中医科。

医院里的伙食也比较好。一天三顿饭。早上稀饭馒头，中午饭菜都多一点点，晚上也一样。这和拘留所的情形大不相同，那里狱警讲话时也常说要实行「人道主义」，但是他们不但叫人饿的头昏眼花，还常常用最难听的话来刺激犯人。他们常说的一段话：「共产党不打你，不骂你，就是要饿你！要饿得你头昏眼花！」

劳动改造

中共的劳改政策是「改造第一，生产第二」。改造的方式包括：消极方面的「自己交代、揭发别人」与积极方面的「认真学习」。揭发别人是劳改「次文化」(sub-culture)

的重要一环，也是犯人当然的责任。一个犯人借着闲谈，可以发现其他犯人隐藏的罪行，和他们内心对政府的不满。基督徒如果和监友谈福音就被视为「放毒素」的「反革命行为」。犯人可以根据揭发的品质立功，争取减刑和提前释放。监方也常利用调换牢房达到揭发的目的。

比如某犯人调房以后，队长就问他说：「你原来和张三同房间时不是说了好些什么共产党的坏话？他都已经全部坦白了，你还不讲？你不坦白是会加刑的！」另外他又到张三那里说：「张三啊，你和某某人在监牢里说了什么共产党的坏话？他都坦白了，你还讲什么江湖义气吗？你讲出来你们怎么骂毛主席的，你不讲你就要加刑的！」他们就用这种办法来鼓励犯人彼此揭发。因此一般对于同监犯都特别小心。不肯随便透露自己内心真正的感受。

同监犯中间存在着一种弱肉强食的次文化。一般刑事犯（杀人犯、娼妓和小偷等）反而比基督徒（纳入政治犯）高一等。如果他们反抗刑事犯的欺负就会遭到对方的毒打。有的信徒避免和他们顶嘴，或许就可维持和平共存的关系。因替倪柝声同工张愚之抄写启示录讲稿而被关在提篮桥的陶珠莉就属于后一种。

她回忆说：「我们同牢的三个人，一个是杀人犯，一个是小偷，而我算是政治犯，地位最低。她们都可以欺负我。她们叫我脚向外，头向内，一边是她们的两对脚丫子，一边是大小便的马桶。她们每天上厕所都是在我的头上。其中的小伦最为凶狠。我们每礼拜六吃一次肉。当劳役犯把饭盒（敞口的）拿到铁栏外面的时候，她就伸手到铁栏外一下就把杀人犯的肉枪去咬一口再放回去。因此就打起来，彼此抓对方的头发，打得不可开交。监警接到报告来问我怎么回事？我只能说不知道，不然她们一定把我打个半死。因为长期闭口的缘故，几年下来我的舌头都好像不会讲话了。」

打小报告立功

揭发同牢犯人的任何不轨行动都可以帮助自己「立功」，以达到「减刑」的目的。因此「打小报告」就构成劳改场（厂）里边「次文化」中重要的一环。监狱的领导对于初进监房的新犯人，经常「上大课」，鼓励他们「动员检举，立功赎罪」。监狱印好一种检举表，供犯人填写。在那阴森的监狱里，「四周围都是一双双凶狠的眼睛，停在他们认为可疑的人身上。他们的两只耳朵时刻留意听着别人的说话。每个犯人就象幼稚园的小朋友专向老师告同学的状一样」。检举的内容主要是针对「反改造」的行为和思想。

沈立行对「到底什么是反改造」的回答是：「五花八门，无奇不存！有互通索情，两相包庇的；有专讲色情；散布黄色故事的；有偷鸡摸狗，扰乱『治安』的；有不服管教当众顶撞的；有散布流言，暗中造谣的；有吵骂打架，破坏秩序的……」。

信徒坚持祷告谢饭，或不肯放弃信仰都算是「反改造」行为，因此他们都永远戴着「老反」（老反革命）的帽子。但是有时也有人竟然敢和大家闹一场恶作剧。沈立行说：「有一次一个犯人大张旗鼓地声称他要揭发一个『大大的反革命份子』，等到狱警召开批判大会时，他所揭发的竟然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蒋介石！』搞得大家啼笑皆非。」

监狱的规定，不许干部动手打犯人，但是犯人打同监犯人的事却常常发生，且常是狱方默许，甚至是纵容的。这是监狱中弱肉强食「次文化」的特征。狱警为了迫使基督徒放弃信仰，常利用同监的刑事犯——小偷、妓女、杀人犯、抢劫犯——来殴打他（她）们。

「调房」也是达到改造目的的一种策略。犯人的房间时常调换，一面是防止犯人建立友情，一面是为了揭发反改造的思想和行为。监方常常故意把凶恶的刑事犯，或放弃信仰的信徒调到不肯放弃信仰的信徒房间里，帮助狱方对后者「做工作」。有一次，汪纯懿房间调来一个年轻人，她是因生活腐化而判刑的。她看见汪祷告谢饭，就打她，还把她的头发一把一把揪去。

学习、批判、斗争

沈立行回忆道：「每星期的政治学习，总要四次到五次，每次一个半小时以上……党的重要档，领导人的报告、讲话等，都要反复学习讨论，并定期听辅导报告……每年年底，都要进行长达一个月左右的年终评比学习，对各人一年中的优缺点，提出表扬、批评和帮助，然后以思想改造为主，评出先进。每个人都要写第二年的改造规划，抄得端端正正，贴在壁报栏内。」

学习的目的是「改造思想」。对付「反改造」的武器就是批判和斗争，简称「批斗」。犯人每天的生活包括两方面。早晨劳动，下午学习。学习以毛泽东的著作为主。另外还加上形势教育（国内和国外），或读人民日报，或听广播，或听队长讲话，传达政府档等。「学习」是思想改造最重要的项目。有时队长亲自召集学习，一般都在大礼堂举行，至于每天小组学习的时候，犯人们都从牢房里出来，坐在牢房铁栏外的走廊上，由小组长带领学习。他也可以指定同组犯人作记录员，或协助监督同组犯人的劳动。每层楼的走廊上都可以有几个小组，相隔不远，可以彼此看到其他小组讨论情况。如果仔细听也可以听到别人说什么。

学习的内容包括国内外的情势，国家的政策（如尼克森访华的事等）。此外还要交代自己没有交待的罪，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以及检举揭发外面什么人作了坏事，以期立功得赏。犯人的劳动量并不太重。「劳动改造」的目的不重在「劳动成绩」，而是重在「思想改造」。所以每天都都坐在牢房中反省、写心得、自我检查。只有劳动表现好和思想改造较好的犯人才能被监长指定去担任「小组长」的职务。

这种学习夹批斗的改造方式是在两种场合举行：一种是透过「小组学习」，另一种则是透过「全监大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外面社会上推行「破四旧」的运动。报纸上报导红卫兵如何把「宗教」消灭了。当汪纯懿的小组进行学习时，同组里有一个新来的犯人谈到外面情况说：「所有礼拜堂都已改为工厂或食堂，而且圣经与诗歌都被烧掉了。」

这时一个原来是青年会教友的人就在小组里发言说：「教堂没有了，圣经被烧了，哪里还有神？可是现在还有人死死地抱住祂不放呢？」这话显然是针对汪纯懿说的。汪感觉非还口不可。

她反驳说：「教堂没有了，圣经被烧了，神还在。」结果学习停止，马上开始对她批斗了。

她回忆说：「小组长就将我从座位上拉到台前，对我进行批斗。与我同监房的无期徒刑犯，走过来狠狠地打我左边的头部。她们又叫我低头（这是承认自己犯了错误的表示），我不服从，她们就用手按我的头，强制我低头，我坚决拒绝；后来我就躺在地上，于是大众就蜂拥而上，狠狠地打我，问我还

要祷告吗？我回答：『要』，她们就继续一面打，一面问。我还是继续回说：『要祷告』。结果大腿被打得发紫了……。」从此以后，每天下午学习就开会斗她，长达一周之久。

第二种的场合是在全监大会上。在文革期间，监方常在可坐数千人的大礼堂批斗「死不悔改的现行反革命份子」，有时还当场宣判死刑，「立即执行，押赴刑场枪决」。北大新闻系毕业的女学生林昭，就是立即被枪决的著名例子。她被处死后，家人还必须付五毛钱的子弹费。她的冤案在一九八〇年「三中全会」后，才公开得到平反。

关于国内外大事的学习常常要开全监大会听取监长的简报。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尼克森访华是一件天大的事。所以在尼克森未来以前便召开了全监大会，听取监长的形势报告。男监队长在大礼堂作了很长的报告，「主要是形容美国已到了不堪设想的败落地步，他形容美国已到了象以前上海在改变政治制度前夕的混乱状态——人心惶惶，商店很早关门以免被抢，可怕与凶险的现象到处都是，所以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美国总统 尼克森不得不『硬着头皮，厚着脸皮，披着羊皮，登门求访。』他若不来，美国就不行了。」监长作完了报告以后，每个小组就展开讨论。汪纯懿因为没有回应监长的「神话」，又遭到了严厉的批评。

监里和监外

犯人们被关在戒备森严的监墙内，似乎与外界完全隔绝。实际上他们仍然有几个管道可以获悉监外所发生的事情。

第一，每月可与亲人会面一次，如此便可了解家庭和亲人的生活。倪妻张品蕙曾把新约的罗马书撕开作为包食物或药品的纸带给她丈夫，其他书籍除马列和科技的书籍外，她也带过唐诗给倪柝声（根据吴磬的录音谈话）。

第二，对于外面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因为小组的「形势学习」，要求犯人读新闻报导和社论（主要读《人民日报》），他们也可以知道一些国内外的大事。监长在全监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也可以使犯人听到一些政治动态。象发生在外面的大社会的「文化大革命」这样翻天覆地的运动自然也燃烧到监狱里面的「次社会」中。那时流行着一句顺口溜：「监狱外面患伤风，监狱里面打喷嚏」，文革期间甚至和外面一同发高烧！

第三，在劳改工厂里，劳动的犯人有时可以从用来包装货品的旧报纸上看到一些过时的新闻。刑满留厂的「厂员」，请假外出或探亲时也会把外面听到的消息传给一同劳动的犯人。

第四，外面遭受经济恐慌的时候也自然影响到监里的生活水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犯人们吃不饱，监狱的干部还必须到外面为犯人寻找可以充饥的补充食品，象树叶和可吃的青嫩草类等。沈立行就是靠着自己的眼力劲儿，不时偷偷摘取大院中榆树上茂盛青嫩的榆钱叶子充饥。这种外面的经济苦状是无法对犯人隐瞒的。

第4章 接见探监的家属

提篮桥监狱有一个「接见」制度。犯人可以定期「接见」自己的直系家属（父母、配偶、和子女）。

每月一次。接见前，狱警发给每个上海有家属的犯人一张表格，犯人填上他需要什么。第一类是衣服和日用品如牙膏、杯子之类；第二类是食品如饼干、罐头；第三类是钱，填上数目。另外还可以写一封信，大概不能超过二百字。填上日期后，表格交给狱警。他们在表上填上接见日期是几月几号就和信放在一个信封里，贴上邮票发出去。信封上犯人要填上日期，但不许封口（要检查）。家属收到信后，就知道可以探监的日期。接见那一天狱警预先告诉犯人：「今天要接见了。你们穿得要干净点儿啊！脸要洗洗，头发剪一剪。」

在海外的华人很难体会到一个「反革命」的家属在社会上所受的欺凌和侮辱，就连当时被「隔离审查」的邓小平家属也不例外。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邓榕回忆说，他们因为是邓家的孩子，搬家后，邻居知是邓家的「狗崽子」住在那里，所以他们出门时，「不是挨骂，就是挨石头，最轻也是为人指点数落。」

吴友琦说：「你们可想象到我们的妻子在提篮桥监狱后门排着队等着开门的时候，那些路过的人都知道她们是犯人的家属，指指点点或公开辱骂，她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她们自惭自愧的心情显于面上是难以避免的！」（但笔者相信倪妻张品蕙应当是例外）

接见的场景

接见的场所是在监狱的大礼堂，也是用来开会和演奏用的。舞台前面放一长桌。接见的当日狱警先到监楼的牢房外面，呼叫可以接见犯人的代号（监里不用名子，吴的代号是 3442）。犯人听到自己的代号，就从牢房的铁门走出去。和其他犯人两个两个排好队一同跟着狱警从楼上走到底层，再走到礼堂去。一般是 20 到 50 人一排，分批接见家属。在他们到达以前，狱警已经让家属在长桌前面站好，面向舞台。然后犯人才从右侧的旁门鱼贯而入。（有的犯人说，是亲属坐着，犯人站着）。桌子是长方型，高约三尺，宽六、七尺，使双方无法接近。

犯人们一进门后，每人的眼睛都张的大大的，认定自己家属的位置后，就赶快坐在他们的对面。接见时间一般只有一、二十分钟。吴是戴「反革命帽子的，按照规定他后面一定要有狱警监视。普通犯人的家属在这个时候，总是先问：「身体好吗？需要什么东西？」一类的话。犯人的一举一动都是纳入接受「改造」的范围。

家属在等候室里时，狱警都是先对他（她）们作工作，鼓励她们和狱方合作，劝勉犯人好好接受改造，以争取减刑和早日出监。所以犯人家属也免不了在接见时说一些狱警们喜欢听的话，象什么「你要好好学习！认真改造啊！」一类的劝勉的话。犯人呢？也总是问家属生活怎么样？孩子听话吧？犯人的妻子也总是回说：「我们生活很好，孩子也好。」实际上犯人（特别是「反革命」）家属在外面所遭遇的苦难是难以形容的！（如下述倪妻张品蕙之例）

接见时间很短，并且双方距离远因此接见一开始，四、五十人到一百人同时讲话时声音杂乱。大家都必须大声吼叫才能听到对方说什么。那种紧张情况犹如纽约华尔街股票中心那些经纪人的疯狂叫喊一般。陶珠莉描写她与家人会面时的情况：「母亲每月都会来看我一次，五年中从未间断，我丈夫江志清也是如此。那时我儿子才十四个月大（是她被「隔离审查」期间生的，生下来不久她就被逮捕了，从此母子二人隔离，一直到十年后平反才得以见面），但认字很早。有一次我丈夫事先让孩子手里拿

着一颗糖果，要他在接见时给妈妈。那一次，孩子果然从桌子对面爬过来把糖给我，因为是小 baby，狱警也没有干涉。有时我们就趁着狱警转身的时候用手势彼此问些敏感问题。」

在这样紧张的接见气氛中，这种信息传递的方式自然免不了误会的发生。首先我们看看张愚之的例子。张被捕后，随后陶珠莉也是因为替他抄写启示录讲义而被捕（时年 29 岁），因此她当然也关心张氏的情况。有一次她在接见时用嘴唇的动作问她丈夫关于张的事，她丈夫就撇开大拇指和食指回答他，一般人都知道是「8」的意思。她觉得心里很得安慰，因为她以为张只判了「8 年」的刑期，但这个手势也可以用来表示「枪」或「枪决」，那么到底是哪一个呢？

第 5 章 「八年」？还是「枪毙」？

张愚之是所谓「倪柝声反革命集团」中唯一被判死刑的人。一九六八年，他十二年徒刑已满，就从浙江乡下返回上海，继续牧养那里的信徒。那一年正是文化大革命达到疯狂高潮的时候，正如邓榕（也是受迫害者）见证说：「连北京大学这个中国最著名的学府，竟然变成了法西斯的集中营，变成血腥暴徒们施虐的场所。」那时多少人「被冤、被屈、被迫害」，多少人「在刑讯中惨死」！连北大的陆校长「都被钢丝缠捆着双手的大拇指，吊在天花板上逼供刑讯」其中最让基督徒难以服从的，就是要求他们敬拜毛泽东的挂像。在野心家林彪的鼓动下，全国人民都必须在毛像面前实行「早请示，晚汇报」的崇拜仪式（像天主教望弥撒一样）。

那是一个在上海医疗研究中心工作的信徒陆道雄，因为拒绝向毛像崇拜，红卫兵勒令他跪在毛像前认罪。他毫不屈服地说：「我的腿只向神和主耶稣跪拜！」因此他日夜被斗，遭受毒打。当他忍无可忍时，就在一天夜里逃到张遇之家，恳求他给他弄一些「全国粮票」（那是没有粮票，有钱买不到东西吃。省市粮票在其他省市不能用，必须有全国粮票才行）。并求张安排他到浙江乡下（张的老家）去躲避。不幸，陆在那里被公安发现，抓押到上海，张遇之也以「隐藏极端反革命份子」罪行，再次被逮捕，与陆同被关在「第一看守所」接受审讯。

接着，替张抄写启示录讲义的陶珠莉也被抓了进去，罪名是替「反革命份子」张遇之抄写「反动教材」。当时张设法通知陶的母亲告诉她：「万一有事情发生，什么问题都推到我一人身上」

下面是张遇之夫人的见证：

世界不配有的人

「一九六九年，公安局先找张愚之谈话，其后又同我谈。他们说：『假如你们二人都放弃信仰，那么你们一切的错误都一笔勾销。否则是关杀头的事，你们回去好好考虑考虑。』

「一九七〇年二月，公安局派人到我家谈话说：『你对你丈夫的事是怎么想的？』我对他们说：『自从他从青海回来，一直住在农村，服从政府管理，奉公守法，他还自己买了一把扫帚，天天扫大街。如果你们认为他还不够，请你们办批评帮助他。』但他们说：『他是屡教不改的人，再帮助也没有用。』这使我清楚他们要下毒手了。在他们处死他的前一个星期，公安人员天天到我们家里来，这时我正上夜班。以前我在厂里做医务工作，负责一个疗养所，他们把我隔离拘留将近九个月以后，就叫我到车

间里监督劳动。

「我向神说：『我不懂为什么，我从未见到他犯什么致死的罪，最多就是在祢面前不够忠心。』神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向我说了话：『有人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这些人都是世界所不配有的人。』『世界不配有的人』使我感到宽释和力量，我觉得他活在这个暴政下，是他们不配有的，因他太诚实，是天国的子民。

「因我是反革命家属，四类份子，他们工作八小时，我得做十小时。在上海每逢共产党要处死犯人时，他们总是向群众宣布死囚的罪行，其实他们早已定案。有一天，他们下班在车间讨论已定案的人，故意大声地让我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在讨论张弟兄时，说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反革命，枪毙……。当我听后，我问神：『他在祢面前如何？』神告诉我：『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罗八 33）对我是何等的宽慰。」

那时张陆两人被拉到上海人民广场接受万民公审，全市居民和工厂工人都要看电视广播公审实况，主持公审的公安人员（那时全国司法机构已经瘫痪，一切都是「无法无天」，不按法律行事了）问在场「群众」应当如何惩罚他们？是否该枪毙？真正的群众谁敢讲实话，只有预先安排好的人大声附和喊着：「该枪毙！该枪毙……！」在这种疯狂的气氛里，就宣布他们死罪立即执行。他们被绑在卡车上（一人一车），先在重要街道游行示众，与其他死刑犯一同押赴刑场！

在街上旁观者中，包括陶珠莉的母亲和她丈夫江志清的父亲。他们看见其他囚犯一个个都已全身瘫下来，由两旁的员警扶着勉强站立，但他们两人耸然站立在卡车上，毫无恐惧，并且面容发光。

主，使我更爱祢

执行枪决的当晚，张的妻子见证说：

「我向神说：『什么时候执行，我可以为他祷告。』我是在公共汽车上听到这个消息的，因此，那天晚上，他们不让我上车回家，怕我出事故，叫我做准备工作，所以我就坐在工厂一个墙角里，把麻布剪成块，堆在我身上为他戴孝。我整夜地祷告和唱诗：『在主亲爱的，现在你去睡，安然可高卧在救主胸怀。亲友虽爱你，莫及耶稣爱。再会，再会，再会。』另一首『God Be With You Till We Meet Again』。（神与你同在直到我们再见的日子）。」

「第二天是厂休，但他们不让我回家，叫我睡在专案组，并有几个人看守我。我求主叫我睡两小时，因我实在日夜都没有好睡。两小时后我一直为他祷告，直到下午一点，里面就没有祷告了。下午三点三十分，他们叫我起床，并向我宣读判决书，内容为：1.对信仰顽固不化，坚持反动立场，并继续参与反革命活动；2.一九六三年时曾编写一些反动宗教书籍；3.当罪犯（陆道雄）企图逃亡时，他曾供给他粮票，因此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他们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没有。然后他们告诉我：『现在你可以回家了，你回去后做些什么？』我说：「我昨天夜班，回家吃饭、睡觉。」在乘公车回家途中，我心中感到释放和轻松，我想愚之已脱离了痛苦、悲伤、惊恐，不再有叹息，不再忧愁，也不再受任何的迫害、羞辱等。而我再把自己奉献给主，只愿一生事奉主，所以我在心中唱：『主！使我更爱祢』与『祢以自己来代替』二首歌。

兹将二首歌词节录于下：

主！使我更爱你，和你更亲密，
为你名更热心，向你话更信，
对你忧更关心，因你苦更贫，
更觉得你看顾，更完全顺服。

(副歌)求主天天扶持我，给我力量保守我，
使我一生走窄路，使主心满意足

(诗歌 297 首)

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
你若不投葡萄入醉，它就不能变成酒；
你若不炼哪哒成膏，它就不流芬芳；
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

(副歌)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
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

(诗歌 458 首)

「第二天，我去上班时，有一位同事告诉我说，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女性）认识公安人员，这位公安人员准她跳上一辆囚车，恰好张愚之就在那一辆囚车上。她看见『他的脸面是那样安详、宁静，与其他那些等待枪决的死囚的苍白、青紫的形象完全不一样』。过了一段时间，我女儿告诉我说，一位华老姊妹告诉她，老姊妹的儿子跟着囚车到刑场，目睹张弟兄在囚车上，很安详，就像在讲台上一样；又看到弟兄从警车上被拉下来时还唱着诗歌，引得他旁边的员警狠狠地踢他的腿，并大声叱责说：『你要死了，还开心什么？』那位弟兄一直看到愚之弟兄一瘸一瘸地走到刑场上。」（根据张愚之夫人列印出来的见证，张愚之殉道的日子是一九七〇年四月廿五日）

陶珠莉在整个服刑期间，一直不知道张愚之被枪决了，还以为他只判了「八年」。但是同样在犯人接见家属时所发生的另一个「意外」，竟然使一个敌视倪柝声的同监犯成为他的知心朋友！

第 6 章 倪柝声的同监犯

倪柝声的牢房在一九六五年时有一个人被调走，一个廿七岁的青年犯人吴友琦被调到他的牢房去补缺。另外一个同监犯是个弱智的年轻人，他的一只手还有点残疾。他只会「吗、吗、呀、呀」地说，很难说得清楚。他的罪名也是「反革命」！

那时倪傲夫（倪柝声在监狱中的名字）是「小组长」，负责带领小组学习讨论，启发大家发言和作纪录。讨论完了，还要打报告给干部查阅。吴友琦被调到他牢房去的时候好象是一天的下午。他搬进去以后，只是看了倪一眼，根本不愿意理他。因为在这以前他已经在走廊上看见倪作小组长的时候，如何带领同组犯人学习讨论。

与倪柝声学习

吴友琦说：「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大概有六尺二左右）。说话声音有些尖锐，很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那层楼有五、六个小组，他们的小组离我们大概十五公尺，那时就有人告诉我：『这就是倪柝声！』因为他在基督教里的名气是最大的，而且很有学问，正如龚品梅（被判了无期徒刑，也关在提篮桥监狱）在天主教中的地位一样。并且我在惠中高中（以后改为「五爱中学」）上学的时候，就知道了他的名字。「大概是一九五三年左右，那时学校组织我们去看一个『反动会道门罪证展览会』。地点就在『湘阳公园』就是现在『教育学院』的位址，目的主要是展览『一贯道』等反革命会道组织的罪行。在展览厅的后面附设了一间展览『基督教』反革命人物的资料，主要包括天主教的龚品梅和基督教的倪柝声。

「展览会上让我最有印象的就是有一架摄影机，说什么倪柝声用它摄了些乱七八糟的事。（这事我以后问过他。他说他的确有一架录影机，但是它只能录不能放。他说他所录的主要是他家里日常生活方面的事。那时除摄影机外还得有放映机才能放），其他方面有关他的事我记不太清楚了，因为我当时只喜欢打球，对这样的事没有兴趣。

「我搬进他的牢房时，对他还有一种敌对的感觉。这是因为第一，我知道他这个人很厉害。人家已经告诉我说：他人很聪明，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不能随便跟他讲话。第二，他是我们的小组长，他需要向狱警报告关于讨论会上，谁发言谁没有发言，发言发的好不好，或是哪个人认罪认的好，而那人认罪认的不好，一切都要报告。我想如果我给他讲话，他肯定要去报告的。因为其他的小组长都是向狱警报告，好把别人打下去，自己立功，可以争取早点出狱的机会。所以我根本不想和他说话。

「哪知他竟自己主动找机会和我说话，像劳役犯来倒开水的时候，他就说：『小吴啊！开水来了！』该学习的时候，他就说：『小吴啊！学习了，来！把你的包包拿出去。』除以外他和我打招呼我也决定不理他，就当没他这个人。这种情况大概持续了一两个月。

「但是学习的时候，他叫我发言我就发言，因为人人都必须发言。比如他说：『小吴，你谈谈你的心得。』我就谈。他作小组长很会启发人，他会叫你讲，从哪方面谈谈，比如说解放以来，你自己亲身的感受，为人民服务怎么样，人民政府怎么好，总之都是一些歌功颂德的事，希望你讲些好的。

「另外，他也经常叫我读报，我的文化程度高。报上的文章，别人念的时候常常念错字，所以他就让我读。不过多半的时间是他自己读。他讲话的时候最常说的口头禅就是把嗓门儿拉高，用他的福州腔的国语说：『那么！怎样，怎样……当初我怎样怎样，一开始怎样怎样……到了那里以后，后来，那么，所以……。』并且喜欢一边说一边用他右手的食指上下比划着。其他人都很佩服他。我开始时并不佩服他，渐渐才变得佩服他。因为他不像普通的小组长，他总是『报喜不报忧』的。」

敌意化解成好友

吴友琦没有想到在一次接见他妻子的「意外」情况下，他竟然和他所敌视的倪倬夫成了朋友。

吴友琦见证说：「一般接见时因为我是反革命。员警总是站在旁边监视。同时也要听犯人和亲属讲话，怕他们讨论什么要翻案的事情，或者犯人会告诉家属什么东西藏在家里什么地方要把它毁掉，或

者我有钱藏在什么地方诸如此类的事。通常员警只是站在那里。只有当发现你做什么违法的事才来干涉。

「但是这一天很奇怪。我跟我妻子刚刚讲了一点话，这个狱警就前来跟我妻子搭讪，不停地问东问西。而且他的眼睛色迷迷的样子。这让我非常不甘心，但是我不敢讲什么。二十分钟的时间很快地过去了，我只能眼巴巴地望着妻子走出礼堂。回到牢房后，我心里满了气愤，越想越生气。牢房没有椅子，我只能站在那里用一只手托住头，暗自啜泣。

「那时倪伯伯和小傻瓜都在房里。他们都看见我在那里泣不成声。于是他对我说：『你知道泣不成声是最难过的，如果能够哭出来就好了。』接着他从我后面一把就把我另一只手抓住。那时，我本想用力把他的手甩开。因为我当时的思想非常清楚，我平时就懒得理他，今天居然这样来抓住我的手。我觉得他是虚假作态，反正作小组长的都是狱警的走狗。

「但是很奇怪，我的手好像一下软掉了，竟然没有力气把他的手甩开。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很奇怪。之后，我就『哇！』地一声大哭起来。这时他就进一步把他另外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跟我说：『哭出来就好了。你哭吧！』这个时候我就像一只困兽跑到大马戏团去了，居然被他驯服了。

「真奇妙，我这个人天生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并且我对他原来就没有好感。但这时，我反而把我心里的话都向他掏出来了。我把刚才发生的事告诉他。结果倪伯伯就劝我说：『事情已经过去了，她下次还会来看你的，下次那一个员警就不一定在那里了。』他继续说，他觉得我的妻子还是很爱我，叫我不要担心。

「从这时候开始，我和他之间的隔阂就消除了。我们也就开始正常交谈了。我也主动帮他作些事，学习的时候我帮他做小组讨论的纪录员。在房间里，开水送来的时候，我们总是先把茶缸放在牢房铁门的外面，送水的『劳役犯』把开水倒到我们的茶缸里。以前他总是主动把我的茶缸替我拿进来；有时也把傻瓜的茶缸放出去，然后替我们两个人一起拿进来。

「那时候他这样做我一点都不领情，因为我觉得那是他自己自愿替我拿的。从那一天开始，我就主动替他打水。那时他的体力还不错，上楼下楼和洗衣服都没有问题。不过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他有心脏病，因为常常看见他吃药，好像并不太严重。以后我们就彼此敞开交谈了。那个傻瓜也从来不打我们的小报告，因为倪伯伯对他也很好，常常把自己的东西送给他吃。」

第7章 倪妻张品蕙的遭遇

当一九五六年二月「肃反」风暴袭击着整个上海教会聚会处的信徒时，作为倪柝声妻子的张品蕙也被列为「隔离审查」的对象。有一天晚上，公安人员夜间突袭她住宅（那时她住在岳阳路甥女鲍贤玲家），她在恐慌中竟然把她预备为倪案向北京国务院总理申述平反的呈文给公安人员看了。

她因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身体虚弱，无法亲自参与控诉大会，该年六月倪被审宣判期间，她也被抓入狱，主要是因为她的不肯交代倪的罪状，一九五七年她被释放回家，接受「监督劳动」，那时一般信徒都不敢和她接触，生活相当孤单，一直到五年后，她才被准许到提篮桥监狱去探望倪柝声。

那时已经是六〇年代初期，当时倪在监中受到相当宽容的待遇，因为当时刘少奇、邓小平主政，

执行温和务实路线，推动全国经济的复苏，重视科技发展和翻译人才。根据张锡康的回忆，倪在上海监狱期间「他们给了他一个大一点的房子，有桌子、椅子，叫他做翻译英文科技书报的工作，因为他的英文好。曾有弟兄看见公安人员陪倪去上海图书馆找参考资料。」

从一九六一年开始张品蕙获准每月到监狱看他一次并带给他食物、药品和日用品等东西，有时倪的二姐倪闰贞（规箴，即林步基夫人）陪她去，还有一次张锡康陪她同去。还有人说「他们在一间有铁丝网隔离的大厅内见面，在狱警监视下谈话半小时」，这显然都是在文化大革命前的事。

文革期间他已不做翻译工作，接见妻子的时候也只能和大家一样在礼堂里面。据倪的亲戚对笔者说，倪最初获准接见他妻子时，曾向她认罪道歉。但是一直到他从提篮桥出去转到上海郊区「青东农场」时，他才对张品蕙坦然地说：「我现在对神对人都没有亏欠了。」

反革命家属

下面吴友琦见证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倪还在监狱中服刑时张品蕙的遭遇。吴说：

「倪妻张品蕙的身体很不好。她的血压常高到 270 或 280。因为倪柝声的缘故也被打成反革命，在家里接受『群众监督』行动没有自由。到什么地方去，都必须经过街道委员会的许可。文化大革命时，她多次被抄家，遭红卫兵的殴打和污辱。红卫兵要把她的头发剪掉，她不肯，就把头发梳成几条辫子，从后头卷到头上。因为她坚信女人的长发代表神的荣耀，如果剪去是极大的羞耻。」

「有一次倪伯伯接见妻子回来很悲伤地对我说：『我的家被抄了。并且最使我伤心的事是我的那些书也全部给他们抄走了。这使我非常心痛，因为那些书是我最爱惜的！』」

「不但如此，他也说，那次接见的时候，他妻子还埋怨他为什么在家里藏了大量美钞，而没有告诉她！这些美钞是从他们家卧室中挂蚊帐的粗竹柱子中抄出来的（里面是空的）。这件事情就给政府一个强烈的理由说，他的妻子不够坦白。这事发生大概是一九六七年，正是文化大革命最疯狂的年日。那时红卫兵三更半夜都会闯进『反革命家属』的家中去抄家，因此也抄到张品蕙的首饰。他的妻子就在这个时候遭到了红卫兵痛痛的毒打。他告诉他的妻子说他所以藏这些美钞是准备日后还债的。我问他：『你欠谁的债？』他说：『盛（笔者按：应为「陈」）锡日，我欠了他很多钱。』他准备以后用这些美金和手饰偿还他。」

综而观之，张品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遭受逼迫有两个原因：

第一，与倪柝声有关。作为一个最著名的「反革命份子」倪柝声的家属，红卫兵随时可以抄家，搜集她自己参与「反革命活动」的证据。在家里被抄到大量的美钞和贵重的首饰都是她不肯「坦白交待」的罪证。这次的事件让她被红卫兵毒打，显然是因为倪柝声向她隐瞒实情所致。为此倪柝声必然对他妻子感到深切的歉疚！张品蕙因为这件事所遭受的苦难恐怕是倪柝声自己无法想到的。

第二，与她的坚持信仰有关。她显然是因为参加基督徒的聚会和向人传福音终于在一九六九年二月，因「思想反动」和利用宗教进行反革命活动等「罪行」，正式被戴上反革命份子帽子。

绝不放弃信仰

下面是张品蕙二姊张品芳的外孙女万小玲的见证：

「我的姨婆倪师母（张品蕙姊妹）年轻时毕业于燕京大学生物系……在文革中……受到许多非人的折磨，……在一九六六年（应为一九六七年）夏的某天，她被一群红卫兵关在一个小房间里日夜连续拷打，我们在外面只听得见皮带一声声的抽打，并夹杂着谩骂恐吓声，那一声声的抽打像是抽打在我们心上，但却没有听见婆婆一声言语。过了许久，婆婆被押出来，眼睛被打伤肿得像一个青馒头，身上也有多处伤痕。那期间她的眼镜被打碎几付，连最起码的人格都得不到尊重。」

「这次以后，红卫兵逼她『放弃信仰』，她不肯，因此她就多次被揪打、游街。有一次，她同另外两位老姊妹一起被迫高举双手，手上套着鞋子，头上带着纸作的尖顶帽子，项上挂着牌子，被责骂、凌辱，勒令她们这样站着达数小时之久，目的是要她们放弃信仰，不再信耶稣。但几个钟头下来，她们三位都一声不吭。最后红卫兵忍不住了，分别一一喊问她们：『你们到底还信不信你们的耶稣？』她们个个都说：『信！』红卫兵们气极了，拾起地上的皮鞋，一下一个扔到她们身上、头上，说：『带着你们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你们的上帝吧！』（笔者按：花岗岩乃指顽固不灵之人，为毛泽东所发明之一句极著名之词。）感谢神！在所有的逼迫中，神与她们同在，赐力量坚固她们。」

还有一次张品蕙因隐藏圣经受到逼迫，万小玲说：「红卫兵把所有的圣经、诗歌都抄走了。但婆婆还千方百计地藏下几本。有一次，外面小孩爬墙，发现屋檐下有两本圣经，婆婆又被定罪一次。我信主以后，有一次偶然在大橱后面发现一本小圣经，真是欢喜万分，那也是婆婆藏的。在那没有圣经的年代里，这一本小小的神的话实在太珍贵了。」

为了坚持信仰，张品蕙在家里接受「劳改」的刑罚，这种刑罚的专有名词叫接受「群众」的「监督劳动」。万小玲回忆说道：

「每天早晚两次，婆婆被勒令要打扫弄堂，当时她虽在狱外，却真是比在监里的犯人还要惨遭凌辱和迫害。任何过路人，包括小孩子，都可以随意过去打她、唾她，因为她是众人所弃的反革命份子。有一次在斗争她的大会结束后，婆婆对我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林前四9）。圣经上早已命定了。』」

万小玲观察到她姨婆之所以能忍受逼迫的力量是来自于「祷告」。她说：「在所有的逼迫中，她总是在批斗她的台上一直不停地默默祷告，始终是靠主站住，没有羞辱主的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所有见过她的人都喊她『白头发』。人人都知道，那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是为了她和她丈夫的信仰受到监督劳动，和非人的待遇，为了主的名，成了一个众目共睹的美好见证。」

张品蕙的确是一个信心坚强的女子。笔者在南非遇见一个从上海地方教会移民到那里的谷姓信徒。他在文革时还是一个青年。他说有一天他正在心情低潮的时候，偶然在路上碰见张品蕙。她鼓励他说：「挺起腰杆来！我们有主。不要怕！」那时正是她遭受惨酷逼迫的时候。

第8章 全监的批判大会

学习的目的是「思想改造」；对付反改造的办法是批判和控诉。就倪柝声来说，他既然被任命为政治学习的小组长，这就证明他无论在劳动上或学习上都是一个「改造表现好的犯人。」但是，他接受改造的底线是「绝对不肯放弃信仰。」这是执行劳改政策负责人最头痛的问题。

到了一九六五年，倪氏在两年内（一九六七年四月）刑期就要满了，如果他能证明自己已经改造好了，虽然还需要度过五年剥夺公权的生活，仍然可以从提篮桥被释放出来。因此监方自然希望他能在这最后一关「考试及格」，公开放弃信仰，然后把他当作信徒改造良好的样板。为着达到最好的效果，负责人常用已经放弃信仰的信徒在批判大会上作见证，以期影响被批判者的心态。这一天的见证人是倪氏被囚前两个最重要的「同工」。

控诉大会

下面是吴友琦对一九六五年那一次控诉倪柝声大会的回忆。

「在提篮桥的时候，倪伯伯常常受到狱方的压力，迫他放弃信仰。有一天，我们大家都被召集到大礼堂去开会。这大概是一九六五年的事情，那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开始。

「大会召开的目的是要批判两个人：一个是天主教的龚品梅主教，一个就是倪伯伯，他是基督教最大的人物。龚品梅关在一号监，那是关重刑犯的地方（二十年以上以至于无期徒刑的犯人）。我和倪伯伯分别被判刑七年和十五年（都是一九六七年刑期就满了）。我们不算重刑犯，所以我们关在三号楼。一号楼的牢房是独立的。他们的牢房是一号、二号、三号这样下去，每一号只住一个人，而且每一号房和其他都是隔开的。

「那天，在控诉大会上，先有几个天主教的犯人到台上去控诉龚品梅。他们揭发了龚品梅的罪行，要他当众认罪，放弃宗教。当时龚品梅没有表态。控诉完了，就该控诉倪柝声了。那个时候，我是跟他一起去参加控诉大会。他们叫他去，是故意要向他加压力，刺激他，目的是要他放弃信仰。

「参加批斗大会的犯人大概有四、五千人，密密麻麻的坐满了礼堂。犯人的座位是按着监房分区安排的。每一个监房的犯人坐在他们指定的区域内。我们排队进去，他就坐在我后面一排的左方，我只要向左一回头，就可以看见他和他的表情。可是我不敢回头看他，我怕引起旁人的注意。因为我认识他，别人并不认识他，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不是同监谁能认得他呢？

「那时候上台去控诉他的，是两个老太婆，她们说是倪伯伯的同工。我现在回想她们的年龄好像不是太老，但应该有五十来岁，跟倪伯伯的年纪相差没有很多。她们这两个犯人上去以后，首先说明她们是受了政府的教育以后，才知道以前受了倪傲夫（当时倪柝声在监狱中所用的名字）的骗了。（她们当时是这样讲的）。现在她们公开表示要放弃宗教，就是不信基督教了。（笔者按：不信「基督教」，不等于不信「基督」）

「其中有没有一个姓汪的我记不得了，姓李的有一个。看她们的样子不高，头发都花白了，身材矮小，带眼镜，叫什么我现在记不太清楚了。这两个人，有一个人先上台控诉倪傲夫。她们的控诉是照着预备好的稿子念的，而且念的时候，不是很流利，结结巴巴的。她们所控诉的不像有些人说的（我出来以后才听到的）有关他的生活腐化的问题、男女的问题。那时她们所控诉的并没有提到像他奸淫她们，或污辱她们这类的事。这一点我可以证明，因为我在场。

要他公开放弃信仰

「那时九号监的女犯人也都去参加控诉他的大会，她们这两个只说倪柝声骗了她们的钱。这一点

讲得很清楚。她们说他骗教友的钱，说他的生意为什么做得那么大，怎么会开那么多厂呢？他开厂的资本都是骗来的。她们也说他对她们怎样怎样不好，说他对她们怎样凶。好像说任何人不听他的话，他就加以迫害。她们揭发他以后，我回头看他，他闭着眼睛，好像若无其事，没有任何表情。随便她们两个人在台上说他什么，他只是低着头，没有任何反应。

「在这以前，他们也针对他开过控诉会，只是都没有让他自己去参加。那是照顾他，没有让他自己去听。这次让他亲自参加是有特别目的的，就是要触动他的灵魂，使他思想斗争得更激烈一点；要他当面看见他的教友以前认为怎样怎样好，当初对主耶稣怎样的忠心。你看现在怎么样了？人家现在不相信了！跟你划清了界限！就是这样触动他的灵魂，希望他倪倬夫也不要再相信了。要让他看看这两个以前和你最要好的人，现在也对你众叛亲离了，你也放弃算了。他们的目的就在这里。他们知道如果倪柝声公开放弃信仰，在中国信徒中间这个影响之大就可想而知了。但是，我看他总闭着眼睛，台上控诉的好像不是他。他只是若无其事地坐在那里。

「我怎么知道这两个老太婆是他的同工呢，这是因为她们自己在台上说她们是同工。那时我自己还不知道『同工』这个名词，我还以为她们是说『童工』呢！就是童子工人。我那时对基督教的知识很少，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同工。

「这次批斗大会以后，经过一两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监长还经常去找他谈话，他们当面对他讲：『蓝绪章是天主教，因为他放弃信仰，就被政府从监狱里释放了。』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放弃信仰，也就可以和蓝绪章一样得到释放。但是无论怎样，他始终不要放弃。每次队长约谈以后，他回来就告诉我：『他们要我放弃信仰，我不放弃！我对他们说：「因为你们没有看见，我看见了。』』我当初理解他的意思是说，他看见耶稣了。他说这话的时候，大概是一九六七年底，就是我们快要分手的时候。当时我听见他这样说，觉得这个人很奇怪，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骗我呢？我只觉得他这个人信耶稣信迷了。他怎么可能看见耶稣呢？」

这事过去不久，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狱方决定要把吴友琦转到安徽的白茅岭农场的瓦屋湾监狱去继续服刑。

第9章 瓦屋湾监狱里的「花岗岩」

到了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吴友琦的刑期还有七个月，就满了。那时他忽然接到狱方通知要他准备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一天大清早四五点钟的时候，他们一共有二十个犯人被带到监狱的办公室前集合。狱警一个个点名后，他们就排队走出监狱的四道大铁门。狱警对他们大声斥喊着：「把头低下来！不许东张西望！」

监狱大门外面停放着一辆大卡车。马路对门站着解放军，还有一挺机关枪对着他们，真象身临大敌一样。那时天刚亮，路上行人非常稀少。卡车离开监狱的时候，监长亲自坐车押送他们。卡车很快的开过市区向西面疾驰而去。目的地是皖南广德县境内的「上海市白茅岭农场」（当时他们根本不知道是要去到哪里）。卡车行驶了四五小时后，就到达广德县城。从广德向西北再开将近一小时的路程就到

了白茅岭农场。

到了白茅岭农场以后，他们被关在一个叫「瓦屋湾」的劳改监狱里，因为他那时仍是「劳改犯」。而这里的犯人也都在服刑期间，正如同在提篮桥时的身份一样。

真实的批斗场景

瓦屋湾监狱的四周是耸立的高墙，墙上布满了电网，墙角上还有解放军持枪把守的岗楼。这时正值盛暑季节，有一天（6月16日）他们四十个犯人从监狱里被带出来到农场「抢收」庄稼，狱警同样对他们用粗暴的声音斥喊：「把头低下来！不许往外看！」就是在路上碰见农村的老乡们走过也必须要闭口无言。

在劳动的禾田里也有解放军带着冲锋枪看守。其中有一个刑事犯劳动了一半的时候，因为憋不住，就在田边小便，恰巧一个农村妇女从对面马路上走过，另一个犯人看到了就向队长报告，控告他假装小便，实在是要故意向农妇暴露下体。当日晚间狱警就勒令他跪在地上，受到同队犯人的批斗和痛打。

这时举世「闻名」的十年动乱，「文化大革命」早已开始了。他在瓦屋湾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了「批斗」是怎样的一种场面，所以印象极为深刻。吴友琦回忆说：「当时我们是十几个人睡一个房间。睡的是通铺，不是一人一张床。房间的中央是空地。床板在房间的两边，靠着墙。白天利用中央的空地学习。大家围一个团坐着，形式和庙里的和尚打禅一式一样。晚上就放一个大木桶给大家便溺。

「那一天白天，小组长（也是犯人）通知我们说，今天不出工，要开会学习。我当时以为可以不用出去干活，在家坐着开一天会，心里还很高兴。一会儿狱警来了。他是来掌握会议的。说了几句过场的话，就叫一个人站出来，站在大家当中。这人约四十多岁年纪，长圆脸，深度近视眼，身高一米六、七十左右。他姓钱，是一个非常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因为他每天都要祷告，每餐都要谢饭。并且是在大家面前公开承认他对基督耶稣的信仰决不放弃。他竟然还敢公然反对毛泽东的无神论。因他这样胆大妄为，队部就决定批斗他。

「一开始大家就开始发动批判。说些质问他的话。有人问他：『你看见过耶稣吗？耶稣在那里？』还有人问他：『你怎么现在不叫耶稣来放你出去？』还有人问：『今天不给你吃饭。你叫耶稣来给你饭吃吧！』甚至有人说：『你决心反改造到底吗？你准备带着你花岗岩脑袋去见你的上帝吗？……』没有想到钱某对狱警和大家的质问寸步不让，毫无悔改之意。这就更激怒了那个带头批斗的狱警。他勒令钱某把头低下来。并且走上去对着他的后脑勺狠狠掴了一掌！那个身体虚弱，又患深度近视的钱某一下子就被打得仆倒在地。

「我当时也被他这一掌给吓了一跳。因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共产党的公安人员这样明目张胆地殴打一个被押的人员！这一掌打了以后，接着就引来更多更厉害的毒打。一些喜欢拍狱警马屁的人不但不同情他，反说他倒在地上是装死。钱某一介书生，怎么能忍受得了这突如其来的一击？

耳朵撕下来了！

「以前在提篮桥监狱里，犯人间打架、打人被认为是严重违犯监规，是不允许的。现在这个队

长（狱警）竟然带头打人，于是不少人就一哄而上。有的上去打他的头；有的上去拧他的手，更多的是上去撕他的耳朵。这时我发现他的一双耳朵确实比别人要大一些。这些丧心病狂的家伙拼命地撕他的耳朵。我那时我真担心再这样下去就要把他的两只耳朵撕下来了！可是他一声不吭，毫不讨饶，而且口中还在不断祷告！

「这时有人一边打他，一边还骂他：『看！他还在祷告！这个死顽固，真的要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了！』（当时花岗岩这句话在大陆非常红。）就在这个时候，钱某突然间高喊了一声：『手要扭断了！』（说到这里，我真不想说下去了。虽然时隔已三十余年，然而今天回忆起来，当时的情景又历历在目，实在是一件痛苦的事。今天晚上我肯定是睡不好觉的！）」

「就这样从早上八时左右一直到十一时许，整整折磨了他三个多小时，直到食堂吃饭敲钟这才停下来。饭后照例有一段午休时间。这时其他人都是可以躺在铺上小睡一会；唯独他不行。他还得站在房中央，低着头，任凭别人羞辱，等着下午继续对他的批斗。」

吴感慨地说：「尽管挨批斗的不是我，但是自从这一次以后，我宁愿天天出去劳动，也不愿意坐在房里参加这样的『学习』了！」

吴在瓦屋湾服刑期满后，就于同年（一九六七）夏秋之间被转送到农场去劳动。因为对于枫树岭农场里的劳改生涯尚缺少比较详细的报导，我们下面先对白茅岭农场的组织和运作情况作一简介。

第二部

白茅岭农场的「劳动改造」

一九六九年底，倪柝声被转往安徽省广德县的白茅岭农场继续接受劳动改造。透过他劳改难友们的叙述以及与亲属间的通信，可供一窥倪氏人生最后年日中的悲惨生涯……。

第 10 章 白茅岭农场概况

中共的劳改制度包括「劳动」和「改造」两方面。改造是针对犯人的「思想」，主要是透过「学习」和「劳动」。二者都是促进改造的手段，最终目的是要「把犯人改造成有文化、有技能的新人」。毛泽东于一九六〇年十月对他的美国老朋友斯诺（Edgar Snow）说：「我们的监狱其实是学校，也是工厂，或者是农场。」但实际上，监狱和劳改农场的主要功能是用来推行毛泽东的「专政」工具。

上海市劳改局管辖的农场遍布在上海近郊和安徽、江苏、福建和青海等省的边荒地区。在安徽北部广德县境内的白茅岭农场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像市内的提篮桥监狱一样，白茅岭农场内的犯人被编列为「上海市劳动改造和教育第二总队」。

白茅岭农场分为两部份：一是劳改监狱（瓦屋湾监狱），另一则是农场，由数个分场所组成。分场下又分许多生产队。一般提篮桥监狱的基督徒犯人都转到枫树岭分场下的「副业队」，又称「牛尾巴村」。提篮桥监狱是用来关押正在服刑的犯人；白茅岭农场则是用来安置服刑期满的「场员」就业的。场员每月可以得到四、五十元的工资，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劳动八小时，星期天例假，不扣工资。此外还

可请假回家探亲或离开农场到附近城镇去购物。但是「留场」劳动是强制的，因此，场员还没有恢复完全的自由。他们的社会地位还不能算是「人民」，而是「半改造份子」。

白茅岭的自然环境是山连山、山套山、高深莫测的地方。在那里丛林密布，一个「即使隐藏十万大军，外面都不会觉察」之处。（吴友琦语，他在山中一个名叫「杨村」的山上伐过木）（参《广德县志》，清光绪年间刊）。但是枫树岭农场周围的环境却非常优美。在倪写给张品琚的信中（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六日）他特别说到「此间山明水秀」并且「还有一个特点，孩子们长得特别好，比上海从前看到的都好。」（见附录六）

副业生产队

农场监狱的组织和运作和提篮桥大同小异，不再多述。白茅岭总场下面管辖的「分场」包括：枫树岭与山下铺（也叫「山下坡」或「白云山」）等分场。「分场」是劳改农场的场地。每个分场里的「场员」又被组成若干的「队」去劳动，并且还分为男队和女队。

倪柝声等基督徒犯人刑满一般都被分配到枫树岭分场的「副业生产队」，简称「副业队」，也有男队和女队之分。男队劳动的场地叫「南村」，女队劳动的场地叫「西村」。

这些所谓的「村」是模仿广德县村镇传统上命名的方式。白茅岭周围的乡下很多都以「姓氏」命名。诸如：冯村、范村、沈村、侯村、朱村、徐村、胡村、陈村、倪村、赵村、李村，丁家村等自然村落。这些都是真正的农村。它们与白茅岭农场里的「南村」、「西村」不同。后者的成员都是劳改犯人「刑满留场」就业的半改造份子。年老和病患的场员可以编入「残老队」，男女队都有。

副业队的工作一般包括刨地、插秧、锄草、种菜、打铁、烧窑等。农场在它辽阔的山坡上开辟了大片的茶田。采茶工作一般都划归女队去做。年老和病患的场员被批准为「残老」以后，劳动量和强度都得以减轻，做些锄草、拾穗（农忙割稻时跟在收割人后面拾取遗落的稻穗）以及「看地」等较轻的任务。女场员常常被派执行「看地」的任务，多半是在夜间。主要责任是防止农场周围的农民来偷田里的蔬菜和农作物。

在下面一章，我们将藉由陶珠莉的例子来具体说明一个场员在农场的日常生活和劳动情况。

第 11 章 副业队的陶珠莉

为何期满转白茅岭？

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陶珠莉的五年刑期将满，按照规定，可由她丈夫江志清带着劳改局的公文到她上海原住地的淮海路派出所去办理恢复户口登记手续。一般说来应该没有问题，但是该区派出所竟然抗拒劳改局的命令（派出所在上海市的权力结构中远远低于劳改局），他们告诉江志清到陶的母亲所在的虹口区派出所去登记（那时，他们的小孩陶陶就和外祖母在那里同住）。但是没想到虹口派出所也拒绝陶珠莉在该区登记；理由是她的户口原来是在淮海路，按照规定不能迁移到虹口路。这样，江志清就像一个皮球被两个派出所踢来踢去，丝毫不得要领（直等到一九七七年，四人帮倒台以后，他才明白原来淮海区派出所竟敢把劳改局的公文顶回去，实在是因为那时四人帮的头头王洪文正好住在她

家隔壁一条街的宾馆内，而其周围两三条街范围内都是对外封闭的)。

在无可奈何之下，江只好到上海郊外去找他服务工厂的党委书记来帮忙，请求他接洽一个郊区的农村公社，准许她到那里去落户。对他的书记上司来说，这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他原来是一个地区的党委书记，许多公社都在他的管辖之下。只要他向任何公社推荐陶珠莉去落户，都毫无问题。但是该书记过了两三、天都迟迟没有给江答复。一直等到星期天，工厂不上班，书记才叫江到他办公室谈话。

他说：「我今天跟你讲话，不是以书记的身份，而是以朋友的关系跟你讲，不然我就违反了党的纪律。我如果想帮你妻子安排到任何农村都没有问题，但是你想想，你妻子是被定为反革命的劳改犯，现在虽然是『服刑期满』，她这种身份在农村一有运动或过年过节，肯定会被揪出来公开批斗，并且在农村一定会给她安排那时最重的活。这样无论在精神上或在肉体上都要承担难以忍受的压力。因此在我看来，她还不如到白茅岭农场去做『场员』，在那里大家身份都一样，虽然劳累一点，但是没有精神上的压力，也不必遭受三天两头的批斗，不过我请你回去考虑考虑，如果你还想让她到农村去，我还可以替你联系。」

江志清回去仔细考虑后觉得书记讲得很对；因为那正是「四人帮」最猖獗的时候。他的妻子如果被弄到农村肯定没有好日子过。甚至还有可能被批斗致死的可能。他将情势和陶的母亲分析商量以后，就决定以「无人接纳」为理由，请求政府安排她到白茅岭农场继续劳动。但是他们并没有告诉陶珠莉这些详情（一直等到一九九五年笔者对他们录音访问时，江才第一次对他的妻子说明到白茅岭的真正原因！）

陶珠莉被监方用汽车送往白茅岭农场，五、六小时后到达广德县城。从那里再坐长途汽车，约一个钟头到达枫树岭车站。下车以后，沿着小路再走半小时才到农场门口。农场外面有高墙和电网，和监狱一样；门口有警卫站岗。进到农场以后，有农场的办公室，是二层的楼房，离办公室不远的地方就是场员的宿舍，离工地相当远；宿舍是一排一排长方形的建筑。陶珠莉所住的宿舍，在进门以后，左右各一排木制上下两层的床架；每一排有三个床，共有十二个室友。这和提篮桥睡在牢房水泥地上的情况相比要舒服得多了。洗澡和厕所都在宿舍外面，前面院子还有自来水。

副业队种稻

陶珠莉属于副业队，也叫第四队，全队有四百人左右。一开始，她被安排种水稻，不管天气多冷，都要赤着脚，淌在水中做插秧的工作。对她一个在城市里长大从来没有在田里劳动的女子来说，这种工作实在是苦不堪言，她回忆道：

「为着便利工作，我们不但要把鞋子脱掉，甚至连外面的棉袄也得脱掉。摆在田埂上，只剩下里面单薄的毛布衣服。早上六点就开始工作，每当赤脚踏进水田时，真是又冷又怕，眼中噙着泪水，和一同插秧的场员排成横队共同前进。每天都有一定的任务要完成，动作绝不能迟缓。每个人都弯着腰，手里端着盛着秧苗的小盆，把秧苗一株株的插在田里，当工作完毕时，全身早已腰酸背痛。

「但是挑大粪桶的工作，要比到田里施肥或插秧更要辛苦不堪。粪桶是用厚木做的，每天先要到厕所后面的大粪缸去挖粪，用一个大木杓子一杓一杓的舀到粪桶里。再用一根粗的竹竿，一次挑起两

个粪桶一前一后。开头根本挑不起来，实在是太重了。我记得我第一次实在挑不起来时，场警就大声骂我说：『你在装什么样！这点工作算什么？』所以每次我挑粪桶的时候，我都要大声的呼喊说：『主啊！主啊！主啊！』很奇妙，我一这样呼喊，就觉得有一股奇妙的力量，使我腰杆挺起来，居然能够一摇一晃的把粪桶挑到田边去。但也因为这样就使我的腰受了伤，直到现在还会疼痛。

「我那时候实在害怕水田的工作，尤其怕挑粪桶的工作。虽然我没有圣经可读，但是我还会向神祷告，呼喊主名，求祂帮助。结果有一天，他们突然告诉我不要种地了，我从水稻组被调出来，安排我到茶树组去劳动。」

茶树组

茶田是散布在一层层的山坡上，采茶的时候需要从山下绕着螺旋式的小路向上走，一直到达山顶。每天采茶的任务是三十斤，任务完成以后就可以下山到农场验交。她每天清早，有时甚至是三、四点钟，就到山上采茶，其原因是清晨茶树上有着夜间的露水附着，尚未蒸发。一片茶叶上有时积有十几滴露水，量虽少却非常重，容易达到三十斤的指标。一般如果三点钟起来，到早上七、八点钟太阳出来以前，就可以完成任务了。回到队部，验货员用磅秤量过，去掉竹篮的重量就是实际的重量。或是超过指标或是不够都有详细纪录。陶珠莉回忆说：

「这样清早采茶，每次都把衣服弄湿了。幸好我母亲给我买了一件雨衣，外面好像漆布，又薄又不会湿，并且还能保暖；另外头上还戴一顶帽子防风，裤子底下也用绳子扎起来。茶田里常常有小蛇，一般是无毒的，但是有一种有毒的眼镜蛇最可怕，有人就不小心被蛇咬了。但是我一直向主祷告，求祂不要让我碰到蛇。但是常常看见那些被场员打死的小蛇，总是觉得惧怕不安。

「上午因为完成任务早，就可以在宿舍休息。但是下午还有其他不同的任务；其中最艰难的工作就是用铁锹翻地。每天的任务是三十米。安徽的土质非常坚硬，人们叫它『铁板土』。用铁锹挖地后，再用脚踩使铁锹吃土较多，以能挖的深。这动作需要手脚皆配合用力，刚开始我的手磨了好多水泡，虽拼命踩锹，仍然无法完成任务。经过好长一段时间后，才能勉强完成。

「总之，一天的作息非常紧张。上午十二点收工以后，吃过午饭，午睡到两点（白茅岭在院南，夏季非常炎热），两点钟场警一吹哨子，大家就必须马上爬起来，不得拖拉，不然就要挨棍子打。管理员一边叫着：快！快！快！一边连打带赶，因此必须赶快披上衣裳，边走边扣扣子赶到工地去。」

陶刚到农场的第一年没有探亲假，第二年才可以回家探亲一次。亲友来探访也是可以的。

温馨的探访

陶的丈夫江志清说：「我第一次去看她，带了很多东西，包括巧克力糖和其他日用品，都包在一个包袱里。到了队部办公室，他们要把包袱打开检查，肉类不许带（怕传染病），但是我知道珠莉喜欢吃红烧肉，就把它藏在我的随身背包里（这是不检查的）。他们的伙食很差，早上吃稀饭，中午可以吃四两白饭，此外还有一些水煮的青菜，有盐但没有油。纵然如此，因为每天从事体力的重活，还是觉得特别香。我那次所带的红烧肉，本来是预备她吃好几顿的，谁知她一口气就吃得光光的（用大茶磁杯吃）。」

陶珠莉在农场时，不但得到家人的照顾，也得到教会中姊妹们爱心的供应。她记得说：「我们穿的是破破烂烂的大棉袄，因为天太冷，腰部都还得束上一条绳子，使风不会进来，棉袄内有一件贴身的小背心（插秧时外面棉袄也要脱掉，只剩小背心工作），头上戴着一顶套头帽，只露出两个眼睛，厚厚的棉手套是家里送来的，但是还要把手套口用布扎起来，否则冷风就会吹进去，冷的吃不消。因此，进场不久我的脸就被冷风袭击而冻伤了。按照农场规定，家里来探访的时候，可以带给我品质最差的蚌壳油擦脸，但是他们常常买蚌壳油把里头的油倒空，装上雪花膏，所以几年下来，我都能擦好的油。这些珍贵的东西，很多都是上海有爱心的姊妹们送到我妈那里转给我的。她们也把一块块的很厚的巧克力糖藏在厚厚的草纸包里（在农场上厕所的草纸是自备的，农场不供应）。有时我饿的心慌的时候，就擎开一块巧克力来充饥。这些姊妹的爱心是我一生都不能忘记的。」

场员关系

陶珠莉常常祷告，求神引领她如何和同队场员们维持良好的关系。她说：「像在提篮桥一样，场员中除了像我这样的政治犯以外，还有不少刑事犯，有时候她们是蛮横不讲理的。在我们的茶树组就有这么一个女流氓，她采的茶叶数量不够，她就要求别人送她茶叶，不然她就要找麻烦，甚至动手动脚。我们小组里还有一个女同性恋者，她的脸是女孩子脸，但是性格完全像男孩子。她对同组的场员说：『你们要给我送供，你不给我送供是不行的。』她要抽烟就要求别人给她烟抽。我呢，我既不抽烟也没烟给她抽。但是她对我特别好，她还给我起了个特别的名字，还对大家说，我是她们中间的荷花，虽近污泥而不染。不但如此，只要有什么人要欺侮我，她就挺身而出保护我。她还对我说：『怎么样？可以吧！够意思吧！』至于我，我只对她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不和她们打架，也不给她们上供，但是神处处照顾我，给我预备一个人保护我；正如圣经上所说：『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祢与我同在。』」

但是陶自己承认她也有软弱的时候。她说：「当我遭遇到无法忍受的痛苦时，我常常祷告说：『主啊！今天我活够了，祢接我去吧！我不要活了！』我什么时候有这种绝望的感觉呢？就是我每天劳动回来都已经累得半死，什么都不想，连家里的人也没有心情去想。我只想躺下来休息恢复我的疲劳。我在主面前叹息说：『主啊！祢什么时候才来呢？你若不来，就接我去吧！我实在是不要活下去了。』所以我实在并不是一个得胜者。我在接受劳改当中，常常向神这样祷告，我不要活了，把我接去吧！……」

就这样陶珠莉完全凭着祷告和从灵里发出的叹息，逐渐得以克服农场中艰苦的生活。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从陶珠莉的女队转到公路对面的男队。在那里，倪柝声度过了他人生最后的日子。

第 12 章 难友何奇又相逢？

倪柝声到了白茅岭以后，竟然又和吴友琦相遇。他们在一起同住、同劳动，一直到倪柝声临死前五天才分手。吴友琦回忆说：

「一九六九年年尾，有一天，下午四、五点钟左右，快要吃晚饭了。我到食堂里去，那时我们的

食堂是和残老队合用一个食堂，因为我们副业队没有食堂，残老队食堂是在我们宿舍东边不远的地方，距离大概有五十米左右，从宿舍到残老队食堂要下一个坡（约三十度）。我到食堂去打饭，我们的餐具都放在食堂里的一个竹架上，免得从宿舍拿来拿去。

「那一天我一进食堂，就看见有四、五个新来的人坐在一个方桌旁边。他们的行李，都放在饭厅的泥土地上。我们一看就知道他们是新来的，像从上海或别处来的。反正我也并不注意他们，因为他们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可是我好像看见其中有一人站着在看我，我觉得其他的人都坐着，而这个人站起来，应当是有缘故的，所以我就回看他，结果我一看，啊！是老倪啊！那时候我还没有叫他『倪伯伯』。

「他就站在那里对我笑，像是碰见老朋友的样子。我走过去和他握手。旁边的几个人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们，因为他们觉得他能在这里碰到朋友，实在太好了，有人可以照顾他，不怕因为是新人而被欺负了。我对倪伯伯说：『唉哟！老倪，你来啦！你到什么地方？』他说：『到副业队。』倪伯伯讲话跟我完全两样，他嗓音很尖，声音又高不像我的声音，是很沙哑的。

「我说：『唉！你不懂啊！我们这里就是副业队。副业队有好几组，你到第几组啊？』他说：『噢，我分到第某某组（这个组是第二组或第三组，我忘记了）』我说：『唉呀！我们是一个组啊！』我对他的行李、被褥都记得，所以我就说：『这是你的行李，我替你拿上去。』他说：『等一下，等一下。』我说：『啊，你大概还没吃饭吧？』他说：『嗯！』我说：『我去给你打饭。』他说：『不要，不要！我自己来！』他就用提篮桥带来的大茶缸去打饭去了。」

饭吃完了以后，吴友琦就带倪柝声到副业队宿舍去。他的床就在吴的旁边，靠门，是最坏的地方，因为别人开门、关门都会吵到他，但是他也不挑剔就安定下来。当时吴友琦注意到他的反应相当迟钝，已不像在提篮桥那样有精神。并且他常常夜间盗汗，衣裳都会湿透。但是他有一个偏方，就是将芝麻和白糖拌在一起吃就可以好。当时吴友琦就带他到农场的合作社买了许多包麻酥糖（是吴暂时借钱给他买的）。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才向吴友琦提起来，他到白茅岭以前是先被分配到上海郊区的「青东农场」（在青浦区）。他在那里遭到小流氓场员用鞭子毒打。连棉袄背后都打穿了几个大洞。所以他似乎被打怕了，因而反应都迟钝了。

间谈的内容

一般吴友琦白天出工，晚上已累的半死，所以二人说话的时间并不太多。但是周末假日时，他们常会坐在宿舍后面竹林前的草地上闲谈。内容方面包括以下几类。第一类是劝勉性的。譬如吴动不动就和别人打架，倪劝他不要心存报复。他劝吴说：「如果你在街上被狗咬了一口，你是不是也要追上去咬狗一口呢？」第二类是知识性的。他对吴讲解蛋白的营养功能和国际知识。他把他到过欧洲和美国、日本等一、二十个国家旅游的经历讲给吴听。他特别提到有一次被请到一个国家去讲道住在一间旅馆里。因为他是中国人而受到旅馆主人的歧视。结果当他离开时，旅馆老板看见成千的人来送他，才知道他是重要人物。因此一定要帮他买张船票，以免得罪当地的客户。

第三类是有关他私人的事：吴问他为什么不加入美国籍？他说因为他爱中国，如果加入美国籍就必须宣誓效忠美国。一旦发生战争，必须为美国作战。同时他还告诉吴说：「基督徒不应当反对自己国

家的元首，因为圣经上说他们都是『上帝安排的。』他特别强调他是永远不会反对毛主席的！这一点使吴大不以为然。另外一个私人问题是他为什么不生孩子？他回答说：「我这个人坏，生孩子不好啊！」吴对他这个答案至今仍然大感不解。

第四类是幽默而富有意义的话（吴说倪从来不开玩笑）。他对吴说：「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天』是最不好做的。今天说『天好』，明天又说『天坏』。其实天有什么好坏呢？」他还对吴说：「世界上最有本领的不是医生，而是理发师。因为医生只能治你的病，理发师可以减少你的岁数，使你年轻！」

第五类是关乎信仰的。倪从来没有正式向吴传福音劝他信主。一般都是用间接方式暗示神的存在。他向吴解释人体细胞中核糖核酸的事，说这个都是原子核中基因的故事。如果张三的儿子长得像李四就是核糖核酸出了毛病了。他们从报纸上读到杨振宁和李政道因为推翻核子中的对等定律共同获得一九五八年诺贝尔物理奖后，他就用人的左右手的「对称」而不「对等」来说明其原理。他也向吴说明「为什么一个人有两只手？」这是因为坏了一只手还有一只手好做事。同样，为什么一个人有两只眼睛呢？因为一个眼睛坏了，另一个眼睛还照样能看！一个人有两个腰子，一个割掉另外一个腰子还照样可以排泄不会死掉。

他问吴说：「这一切都是谁替你安排的？有这么巧啊？」他唯一讲到的福音见证是他早期在福州乡下（梅花乡）传福音如何因为祈祷改变天气，使当地人抬着「大王神」游行时，忽然天气突变，降下倾盆大雨，把泥巴的「大王神」浇得面目全非。

手工劳动

关乎他在农场的劳动情况，因为他患着严重的心脏病，所以就被分派做些轻松的活。吴说：「关于他的劳动任务，队里倒是相当照顾。基本上没有什么劳动，顶多不过是在房间里做一些轻松的事。比如我们收割的黄豆里面有石头或烂泥或叶子，他就和几个残老场员留在宿舍里头捡一捡，弄干净，他们工作是在宿舍外面一个晒衣服的场地。他们四、五个老头子一起坐在场地上工作。另外他们做什么我都不去关心，因为我每天有干部指派的工作要到外面去做。他们每天的工作干部也有安排。反正都是手工劳动。有时候在宿舍周围拔拔草，有时候让他们洗一洗马桶（我们宿舍门前有一个大马桶，是为了我们晚上起来小使用）。另外也可能派他们搞一搞家务，把宿舍地上的烟头扫扫，清理一下别人所吐的痰。以后我们副业队的食堂迁到公路对面山坡上，因为残老队和副业队闹矛盾，不让我们用他们的食堂了。

「但是他的体力太弱了，爬两个坡去吃饭，实在没有办法。所以我每天三顿饭都替他打来给他吃。后来他连这些轻微的工作都没有力气做了。从此就整天坐在那里读读报纸、看看书、写写东西。他写东西写的很多。小说他不看，他只看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他对毛主席的选集四册全部都可以背出来。

「他曾对我说：『如果有人问我毛主席说的这句话在第几页第几节，我都能告诉他。』他还幽默地说：『我其他事情不能做了，但是为人民服务这件事我还是能做的。』我听他这样说实在觉得吃不消。你看他对毛主席的感情有多深啊！凭良心说，我对毛主席的著作是没兴趣看的，也没办法看，因为我记得他所讲的话，我没有办法接受。比如他说：『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个话怎能让人接受呢？如果敌人反对吃大便。我们就要吃大便吗？这不是神经病吗？」

其实倪柝声也不是完全盲从毛的思想。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在农场的最后一两年所过的日子相当艰苦，不但在生活上遭到刁难，还遭到不停的批判、斗争，一直到死！

第 13 章 心脏病发了

倪柝声在白茅岭劳改场的时间只有两年半（一九六九年末到一九七二年五月底），那时林彪权势极大。在一九六九年中共九大上，他被选为中共副主席并定为毛的法定继承人。他在军中和全国发动「效忠」毛主席的狂热运动，实际上是要架空毛泽东，最后用政变方式取而代之。

他发动全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并且要早晚在毛像前敬拜。因此，场员们在文革前学习时，如果发表一点合理的言论也许可以，但现在可就不行了。倪柝声在下面所提到的政治学习上的发言，可能是因为他不知道外面的政治气候已经激化到极左路线的巅峰了。

天天挨批

吴友琦说：「有一次，我们小组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读到毛主席的话说：当我们受到『群众』批评的时候应当存『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同时也应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时候大家都必须要发言了。倪伯伯呢，他平日是不大讲话的。你叫他学习什么，他就去学习。哎呀！那天，他忽然发言了！他说：『我只能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做不到。』他这么一说连我也有点楞住了。」

「小组长立刻向队部领导报告，惹得队长大怒。他们本来就想要对付他。现在他这个老反革命份子竟然敢反对毛主席的教导，因此就开始『批斗』他了。他这个七十来岁的老人，就为着这件事天天挨批，一直批了半个月之久。批斗时他们让他把反对的理由讲出来。其实他的理由很简单！他说：『比如说早上我不肯准时起床，你说「老倪啊！你以后要准时起床！」那么我觉得这个批评是对的，我就「有则改之」。如果我的确是没有准时起床，我应当改！』

「但是如果你说：『老倪啊！你不能睡在床上抽烟！』这个就奇怪了！我从来就不抽烟！我怎么能『睡在床上抽烟？』我就是不睡在床上，也不抽烟啊！你说：『你虽然不抽烟，但是你要「无则加勉」啊！』这种「无则加勉」的事情就太多了！你不是叫我无所是从吗？」

「他又举例说：『你甚至可以说：「嘿！你不要调戏妇女啊！」我说：「我几时调戏过妇女啊？」你说：「你没有调戏过妇女，那你就『无则加勉』好了！」这类的事情太多太广了。』我们觉得他提的很有道理！这样大家就批不下去了。因为他讲的是对的啊！所以后来批斗他时，凡是队长（员警）在场就有人讲他：『你思想反动！』『你是老顽固啊！』之类的话。等到队长一走，大家就不讲话了！大家就天南地北的讲笑话了。大家觉得他讲的有道理，所以就批斗不起来了。」

还有一次，队长们看了他的「自传」后，就批评他「夸耀自己」，就又开始对他批斗起来。这次的批斗连妇女队的人也都奉命来参加。

根据笔者在上海访问的张鲁纯姊妹的回忆（那时她在妇女队的残老队），她说：「倪柝声那时的身体非常弱，他的脸显得浮肿，人很高，但很瘦，背有点驼，头发全白。这个比较大型的批斗是在一个

大厅里举行的。他靠着墙站在台前面对众人。大家你一句，他一句的，反正都是要想出一些批评他的话才行。有人说：『你真是太顽固了！』另外一个就说：『你真是一个老反革命！』也有人说：『你崇洋媚外！』还有人说：『连你放的屁都有洋味！』而他呢，不管他们怎么骂，怎么胡说八道，怎么骂得他体无完肤，他总是低着头，一声不响。最后他的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了。他问队长：『我可以不可以坐下来？』队长就准他蹲下来靠着墙壁。但是员警一走，大家就不批了。转而聊起天来，一直到规定批斗的时间满了为止。」

置之死地

有一天，倪柝声的心脏病突然发作。吴友琦记得当时紧急的情况：「那天是晚上的时候，他的心脏病突然发作。我眼看他不行了，就到办公室去报告那里的侯医生（是位女医生，这人非常坏）。

「她来了以后，就说：『怎么样？又不行了？』她就回去把队长一块儿叫来。我们本来以为队长来是关心他，结果队长竟说：『倪大夫，你怎么了？身体不好？』那时倪伯伯躺在床上，讲话的力气都没有，就向他们点点头。他们就说：『好！那就把你送到总场去看病。』

「这句话的意义是什么呢？白茅岭总场离我们枫树岭分场有二十里左右的山路。那时没有柏油路，送他去的车子是农村用的拖拉机！他在拖拉机上咚咚咚，一路上要上坡下坡，颠簸得非常厉害。那么咚咚了二十几里路以后，在半路上还不把他颠死吗？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

「我一听，就觉得岂有此理，他们应当立刻给他吃一点药，像什么保心丸啊一类的药！而且这个时候已经是夜里七、八点左右了。倪伯伯摇摇头，表示不要去。我马上就说：『这怎么行呢？他现在病得这么厉害，在拖拉机上怎么能吃得消呢？』那时，倪伯伯紧握着我的手，轻轻在我耳边说：『友琦，我不能去！』我们正在讲话的时候，外面拖拉机已经来了。

「这个姓侯的最坏，她想利用这个机会，让倪伯伯死掉最好。拖拉机在外面砰砰砰地发动着，就要带他走了。这个时候的情况非常紧张。我在宿舍里头也有几个要好的朋友，我就对他们说：『你们说，这种情况好去吗？』他们马上出来三、四个人，异口同声说：『不行！不行！侯医生啊，你是医生啊，他怎么能到总场去呢？他半路上就要死掉了。』其实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不是要把他害死啊？我们就都站出来挡住他，不让他去。

「这个时候，姓丁的队长，他也是个坏家伙，说：『吴友琦，你多管闲事！你不让他去，出了事情你负责！』他的态度很凶，他问我：『你跟他什么关系啊？你对他这么好？你是他的什么孝子贤孙啊？』他这样讲，我也不怕他们。因为按照农场规定他们不能打我，只能骂我几句，训我几句，说什么『你这个小反革命，和他这个老反革命，是一丘之貉。你们都是反动份子！』经过我们这样反对以后，他们终于打消计画，把拖拉机开走，但是他们还要另打主意对付他。」

第14章 丧妻之痛

主后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倪柝声接到上海甥女鲍贤玲的信（张品蕙就住在鲍贤玲家里），知道他妻子张品蕙去世的消息后眼泪哗啦啦地流了出来。原来他妻子的大姐张品琤就要从北京到上海来看他们。有

一天（大概是十月初）倪妻张品蕙踏在桌子上到衣柜顶去拿被褥好为品琤睡觉用，没想到桌子不稳，她摔了下来，摔断了两根肋骨，再加上她的血压本来就很高，过了一个多月后忽然心脏病发，三天后便去世了。

倪向农场领导打报告，要求回家奔丧。结果报告打上去，队长不批准，他们说：「你这个人身体这么坏，你到半路就死了。没人照顾是不行的。你一个人去是不行的，我们要为你的健康负责。她已经死了，你去也没有用啊！」吴友琦表示愿意陪他回去，也被拒绝。以后他一再打报告，总是不被批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二人还写了一首应对诗以表达内心的哀情：

倪柝声的诗：

千声唤，万声呼，卿声我惯听。

吴友琦的应对：

横报告，竖报告，为何不批准？

吴友琦觉得他们太残酷无情，还讲什么「革命人道主义」呢？张品蕙去世后，张品琤成为倪柝声精神上的重要支柱。他因为没有得到许可回家奔丧，最终连自己妻子的遗体也没有机会看到。在他给「大姨」（他信里这样称呼品琤）和他甥女鲍贤玲的书信里，一再要求她们要把他妻子临终前穿过的旧衣物寄给他。特别他要张品蕙穿过的最贴身的东西。他的意思是摸一摸这些遗物，也似乎可以凭着想象摸到他爱妻的身体。下面从他致「大姨」等信中的片断，可以使我们体会到一点他当时的心情。

（信件一）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六日致「品琤大姨、贤玲甥女」信：

「四姨（指品蕙，她在姊妹中间排行第四，品琤是老大。）新的东西我全不要。我所要的是她最后用过的衣、裤、头巾、蒙头、旧袜子、手帕、牙刷以及其他小件的纪念品。」

（信件二）一九七二年一月九日致「品琤大姨、贤玲甥女」信：

东西已经收到，四姨去世，我要一些纪念品，以志永好。寄来的东西，我要她最近穿过的旧鞋一双，及她旧的她穿过的内绒布的衣裤。请你替我寻出，至为感谢。千万寻出。」

品琤在一九七二年春天曾到白茅岭去看倪，那时除了上述衣物外，还特别带了一缕品蕙的头发和一条毛巾。那条毛巾是他们两人交朋友时倪从外面回来有时累的满头大汗，品蕙用那条毛巾替他擦汗的。

他在展抚遗物时自然是「伤痛不已」。一九七二年五月六日是倪妻去世半周年，倪柝声于同日连续写给大姨两封信。这两封信透露了他死前三周半时的心情。

第一封透露了他健康情况恶化到了「病已缠绵」的险境。同时在这封信里他表达了对亡妻的歉疚和深思。也表达了希望再和品琤见最后一次面的强烈愿望：

（信件三）一九七二年五月六日致「品琤」信：

「明日是蕙妹逝世半周年之期（5月7日）。近半年来，变化实在太太大。回首前尘，展抚遗物，叫我不能不一直心感悲痛。二十年来，不能一次伺候她，总是终身遗憾。一切都是我对她不起。害她因

难。我病已缠绵，经常反复。生活我尽量简单化，以免麻烦人家。病中实在想念自己的亲属，想要和他们一起，但我顺服环境安排。十余日来，深思蕙妹不能自己……。

你还想南边来，不想？我不知道如何说才好。」

我只有祝你好。

第二封信是当日收到品琤四月廿七日信，得知她已经决定要南来看他，因此他希望她这次能多住一段时间：

（信件四）同日致「品琤」信：

「顷收到你 27 日的信。至谢。你如能来，多见自己的人一面，实在是好的……望你这次多住一点时间，不要匆匆而去……六叔汝励在解放前后，都对我思想有帮助。不知他的地址在哪里。还要兴涛侄婿的地址。」

大概也就是在这段时间的前后，倪柝声对吴友琦说他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在外国，名字叫「李常受」。他告诉吴友琦说：「你出去以后，一定要和李常受见面，把我的情况讲给他听……你看到李常受，就像看见我。你可以告诉他，我并没有放弃信仰……」。

第 15 章 幽谷中的哀鸣

倪柝声在张品蕙逝世半周年的前一天（五月六日）写信给张品琤，向她询问「六叔」张汝励和「堂侄婿」马兴涛的地址。这显然都与他刑期已满准备申请「出场」的事有关。如果有合适的亲戚收纳他，这时他极想完成他「落叶归根」的愿望。他是一九五二年四月十日被囚，到一九七二年四月十日服刑二十年期满，依法应当释放。

可是他要到哪里去呢？谁愿意收留他呢？因此他希望和张汝励联系，必定是他以为后者仍然在政府里有影响力，或许可以帮他早日获准出场。他所以想和马兴涛联系，也是希望他可以「收留」他，可以到马所在的公社去落户。张品琤于五月六日和十一日曾两次写信给倪柝声。在这两封信里，张品琤一定把马兴涛的地址写给他了，因为倪于五月十六日收到这两封信，六天后就于五月廿二日写信给马兴涛求他帮助：

兴涛侄婿：

我的情况，我想婶婶在世之日，一定对你谈过。你知道我是有大姊寄家用的，所以生活没有问题。我年老病多，极想到自己的亲人那里去。落叶归根可以寻个归宿之处。我迫切希望，你能替我负责办妥这件事情。一切方面，全依靠你。婶母去世至今六个半月，我五内俱摧，过日为难。我希望你勉力为之，将证件寄到此处……，听说到浙江去，粮票有问题。我想，我吃的很少，有解决办法，不要紧。

廿多年未通信。常在念中。

祝你好

述祖五月二十二日

倪柝声于同一日也写信给已经来到上海的张品琤，请她帮助在亲戚中找一个在农村「可以挂钩的人」，显然他没有把握马兴涛是否能够帮他解决问题。这里他也透露了他刚刚心脏病发的情况。「心房颤动」、「好几小时」是非常痛苦的事。该信说：

品琤大姨：

我和领导谈过，关于我的出场问题，他说：「北京上海不能去。」要去小的地方，如农村等。只要有证明来，政府要按政策办事。不必找……谈。

所以请你代我在亲戚中找可以挂钩的人。可以向其说明，我有生活（来源）希望他收留我。请公社证明我可到他的地方，可以收纳我。

希望能在亲戚中替我找人。马兴涛也是可以商量的一人。请你和他商量，或者别人。

拜六夜里又发一次好几小时的心房颤动。后来吃了地戈辛，人能支持。礼拜睡一整天。我在病中心情极想回到自己亲人在一起。落叶归根。我和大家二十年失了联系，只好请你……我因心肌梗死……很困难。

祝你好

述祖（五月）廿二日

他在信末附言还特别请品琤寄共产主义的书。附言说：「家中有《联共（布）党史》、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请由邮寄来。」

这封信发出三天后，即五月廿五日，倪柝声忽然接到农场通知，第二天就要把他调到离开枫树岭约有十里路的「山下铺」分场下第十四队的「修养组」（或「休养组」。「山下铺」又称「山下坡」，也叫「白云山」）。这个「修养组」是座落在一个山沟里的小农村。从枫树岭分场到那里去，需要沿着公路北上到达与公路交叉的一条小路口，然后再沿着小路往里走，再翻过一座山岭，才能到达山谷内的那个小村落。

他接到农场通知后，当天立即给张品琤写了一封短信。这封信是寄到上海鲍贤玲处代转（那时品琤已经从北京坐火车前往上海）那封信说：

品琤大姨：

我将于明日调离枫树岭到山下坡农场去。你来的时候不要买票到枫树岭，要买票到山下坡下车。比枫树岭再远一点点，进去第二站。我曾经发一信给你，比这封早，不知收到了没有。望早见面。

祝你好

述祖五月廿五日

倪柝声五月廿六日从枫树岭被转移到山下坡（即白云山）分场，当日他又写了一封信给马兴涛。请求他代办一张公社的证明，好据以向农场请求出场许可。信中说：

兴涛：

我在枫树岭时，曾另给你一封信，望你能替我办到公社的一张证明书，说明你们愿意收纳我，保证我的生活。（你知道我有大姊寄家用）你们态度要坚决明朗……。

我今日从枫树岭调至白云山休养组。望你努力而为，给我一封回信。证明要直接寄给白云山农场第十四队。抬头是由公社写给安徽广德县白茅岭农场，但是你寄来时要寄到安徽广德县白云山农场第十四队。

我极望回到自己亲人那里去。请你努力。

祝你好

述祖白 五月廿六日

此信证明白云山农场是白茅岭总场下的一个分场，而十四队就是分场下的残老队。证件需要先经白云山分场审核，然后转呈白茅岭总场批准（最后呈到上海市劳改局）。在这封信里倪柝声像一只困在幽谷中病危的老鸟，迫切地发出求助的哀鸣！

根据鲍贤玲与笔者的谈话（二〇〇〇年三月），张品琤那时虽然已经到达上海。但是因为一时买不到公共汽车票，要等到一周后才有票。没有想到倪柝声于五月三十日写给她一封信，也是最后的一封，竟然告诉她「可以不必来了」！该信很短：

品琤大姨：

我调到山下坡十四队，这里离开车站还有十里路，还要翻一座山。你来实在不恰当。可以不必来了。我病中心仍喜乐，请你不必挂心。我仍尽力保守（促使）自己，不要因病痛难过。品蕙骨灰请你处理，一切都拜托你，我都同意。

纸短情长。祝你好。

述祖白 五月卅日

这封信即使是当日从那个小农村发出，最快也需要三、四天才能到达鲍家上海的地址。也就是说，最快也要六月二日或三日才能收到。但是在这封信还没有到达上海以前，倪柝声已经于当天午夜后两小时去世（即卅日凌晨二时）。六月一日张品琤收到倪柝声病故的电报如下：

〈发报〉广德

〈收报〉上海

〈报文内容〉你妹夫倪傲夫病亡山下铺。

这里有一个问题：倪柝声于五月廿五日给品琤的信里还表示说「望早见面」。而第二天（廿六日）写给马兴涛的信中也依旧表示「极望回到自己亲人那里去」。那么为什么四天以后（三十日）他竟然改变主意告诉她「不必来了」。他明知道张品琤随时都能从上海来看他，但是为什么他要放弃和「亲人」最后见面的大好机会呢？

木匠的陈述

笔者三年前在上海曾经访问过在枫树岭劳改过的张鲁纯姊妹。她是枫树岭分场副业队女队的场员。

她曾经参加过倪柝声在农场被批斗的大会（如前述），所以对倪有深刻的印象。

她说她记得：「倪柝声故去的第二天，一个木匠从『山下铺』调到枫岭来做木工。他原来是在上海求新造船厂工作。他是因为犯错误来农场接受『劳教』的。他来枫树岭也是想到我们女队为一个女场员介绍男朋友。有人告诉他说，这个女物件是『信教的』（是个天主教徒）。木匠马上反应强烈地说『还信！还信！我们那里有一个信教的。真反动！他天天挨斗。他死的前一天还挨斗。他家里很有钱，亲戚和子女都在国外。他跑过十几个国家，替他们作特务。他有很多药。死的时候，银行里还存着七千块钱呢。他不是这样，不信教，还不会死。他是信死的！』」

这一个木匠的说法，显明了当时在劳改场里倪柝声被塑造成的影像是如何！也说明他到底在什么情况下「病故山下铺」的！

第 16 章 「我因信基督而死」

张品琤于一九七二年六月一日在上海接到倪柝声病故的电报时，她是住在上海岳阳路鲍贤玲的家里。那时倪柝声四妹倪德诚（张师母）的女儿张佩心和她丈夫吴馨也住在上海。当时他们三人聚集在鲍家（岳阳路），商量如何料理后事。最后决定由吴馨和鲍贤玲的大女儿万小玲陪同大姨妈张品琤，带着那封电报尽快赶去农场。他们买了六月二日的长途汽车票，由上海直达安徽省的广德县。到达广德县城时已经是下午一点钟。午饭后就去买广德到白茅岭的汽车票。但是最后一班车已经客满，只剩下一个空位。同时因为他们不知道倪柝声山下坡的住处离公共汽车站有多远。所以决定让吴馨当天先去。万小玲和张品琤就在广德城里找旅馆暂住一夜，次日一早再搭第一班公车去农场。

倪死的当天情况

吴馨到达山下坡公车站已近傍晚。在那里他先打听好如何到十四队去，就沿着一条山路向西走，翻过一座山，再沿山坡而下，最后到达一个四面环山的小村庄。那里房子不多，只有十几户人家。那时已经黄昏，他向那里的村长打听到倪柝声的住处，结果发现他的房间已经上锁，不能进去。村长告诉他，他们那儿夜里不招待外人，他只能再翻山越岭回到山下坡农场队部去。

到了队部办公室天已黑了，他在那里由一位姓陆的管教队长予以接见。他把电报给陆队长看，然后说明他们有三个人同来处理倪的丧事。吴馨也说明小玲和品琤当晚留在广德县城过夜，明日才能到达。他和陆队长简单交谈一番，发现他的态度相当客气。

关乎倪死的当天情况，陆队长说：「五月三十日早晨九点钟，修养组的小组长还不见倪从队房里出来，就叫人推开房门去看他。他们发现他仍然卧床未起，并且已是奄奄一息。于是立刻叫队里的卫生员来给他打强心针。卫生员看他病情严重，就叫了农场的拖拉机把他载到白茅岭总场的医院去。在那里给他打针、用药抢救无效。于五月三十一日凌晨二时死亡。」

陆队长还对吴馨说：「看来他是自杀死的，有绝命书为证。」吴问他：「什么绝命书？」他就拿出一张纸，是从练习簿上撕下的半页纸张。上面写着一些很大的字。陆说这张纸是在倪傲夫的枕头底下发现的。吴馨看了确实是倪柝声的笔迹，内容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人赎罪而死，三日复活。这是字

宙最大事实。我信基督而死。」吴磬看后就对陆说这不是「绝命书」，是他预知自己身体不好，不久人世了，但是他至死还坚信他所认识的基督。

吴磬还对他说：「你们农场发来的电报不也是说他是病亡的吗？」但这位陆队长还是一点都不明白那句话的意义。他说：「他为什么要『信基督而死』呢？」特别因为他们收拾倪柝声的房间时，的确也看到他存有硝硫干片、地戈辛等许多药物。这些东西一定也增加了陆队长对「信基督而死」这句话的误解。

陆还对吴磬说：「因为天气炎热，没等你们来已经把他火化了。」吴磬看了那张条子，当时就把那几句话记在心里。以后又把它们写在纸头上。当晚陆队长写了一张条子给那里招待所的负责人为吴磬安排食宿。

第二天（六月三日）万小玲和张品琤从广德搭乘第一班公共汽车来到山下坡。吴磬到车站去把她们接到队部与陆队长会面。陆又对她们重复了前一天对吴所讲的话，也给他们看了他所说的那一张「绝命书」。最后品琤问起倪的遗物，陆队长说：「他的现金（指存在农场银行的存款）是一笔极大的数目。因为倪做夫没有什么直系亲属，所以那笔钱就归国库了。」品琤要求到倪的房间去处理遗物，陆队长不让她去。当晚陆队长写条子给招待所「小林同志」为她们安排住宿。

安详过世

第二天（六月四日），陆又写了一张纸条让吴磬到农场的「火葬场」去领取倪的骨灰。因为火葬场离招待所还有相当远的距离，大概要走一、二十分钟的山路。他就让小玲陪着年老的品琤留在招待所。他一个人带着那张条子去火葬场去了。

到了那里，他才发现，所谓的「火葬场」只不过是农场用来烧砖的窑场，它的任务是生产砖块及兼管火化尸体。他找到那个负责火化尸体的农民。他姓茅，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吴问他倪做夫尸体的情况。

他说：「他是安详过世的，尸体一点都没有反常的情况。」吴又问他：「像不像自杀人的尸体？」（这是他有意去问的）茅回答说他火化了很多尸体，他可以认出自杀人的尸体，因为自杀的人的脸常是可怕的。但是他可以作证倪做夫肯定不是自杀的。因为他脸的样子很安详、正常，人也是白白胖胖的。茅告诉吴磬说他那里只管火化尸体，所有骨灰盒都存放在另外一个地方。吴磬又走了半小时的路才找到了那个存骨灰的房子，是一个瓦屋顶木板墙造成的简陋建筑，像仓库一样。里面有一排一排的架子，上面放着一、二百个骨灰盒。

管事的人先给他看登记簿。但是他找了半天也找不到「倪做夫」的名字，簿子上只有一个发音和「倪做夫」相似的名字：「李均扶」。在那里每一个骨灰罐的前面都放了一个四方的「丧葬证」纸片。上面记载着死者的姓名、年龄、籍贯、死亡原因和火化日期等基本资料。

吴磬从火化日期和籍贯等方面确定这个「李均扶」就是倪做夫的误写，因为这是六月一日唯一被火化的尸体。显然管理骨灰的农民因为知识水准的缘故，把倪的名字全部写错了。至于在卡片上注明倪的「死亡原因」是「自杀」，这显然也是他从陆队长那里听来的误解和误写。

吴磬一行取了骨灰以后就从白茅岭农场北上，经过郎溪转车到江苏的溧阳县，再转搭火车返回上

海。他们把倪柝声的骨灰和原先倪妻张品蕙的骨灰并排放在吴馨家中一段时间以后，就由他儿子把它们一并送到浙江海宁马兴涛处，埋葬在马家的桑田下面。

肉身的倪柝声在今世的旅程就此结束了。

后记 蜕变的倪柝声

笔者相信任何人读过本书以后一定会发现一个突出的事实。那就是：在本书中所呈现的倪柝声的影像，如果与张愚之、陶珠莉、汪纯懿等人相比，他在二十年的牢改生涯中似乎缺少了像他们在同样环境中所表现的刚强不屈的见证。即使在他被囚以前，因为受了亲戚张汝励等人的影响，曾经在不违背圣经基本信仰前提下试图与政府当局充分合作。

如前所述，他曾经带领在「上海聚会处」聚会的信徒参加三自爱国运动，也亲自主持教会内的政治学习，并发表了「我是如何转过来的」重要讲话（见「附录一」），以说明他如何认识到他以前认为信徒应当「超政治」的「错误观念」。

服从而非顺从

不但如此，他还精研马列的古典著作并熟读毛泽东的文集。他一直深信：信徒即使受到迫害甚至被囚，仍应当服从政府的权柄，不能予以对抗（罗十三 1-2）。因此他入狱以后，仍旧与政府合作，认真学习，而竟能被提篮桥监狱的领导指派为政治学习的小组长。但是他与政府合作的底线是绝对不放弃信仰。他对政府的态度是绝对「服从」，但是如果违反「信仰」，他就不能「顺从」。这正如旧约中的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一样，他们对巴比伦王的态度也是「服」而不「顺」一样。（但三 13-23）倪柝声临终前写在纸条上的「我因信基督而死」等话，证明了他「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来十一 2）

然而我们不能否认，倪氏在肉身生活中所表现的并不是一个「完人」。正如保罗在希伯来书十一章所列举的信心见证人中没有一个「完人」一样。我们信心的祖宗亚伯拉罕并不是「完人」；那个「合神心意的」大卫王，他是我们救主耶稣的先祖，更不是「完人」。他在乌利亚妻子的事上违犯了神十条诫命中五条最严重的诫命（撒下十一章）。很希奇的是，圣灵在希伯来书里似乎完全漠视他这严重失败的一面，而把他列入那一系列「信心」见证人的彩虹中！我们是否都有这样的经历：每当我们读到大卫的诗篇时，不只是他表达「忧伤痛悔」的诗篇（五十一篇），而是他写的任何诗篇，都会让我们摸着神的爱和祂主宰的权能！

正如笔者在序言所说，我们应当从神的观点来理解一个被神大用的器皿，包括他在肉身中的成功和失败。神借着祂释放祂的心意和启示，这完全是因着神的拣选和怜悯（罗九章）。就保罗「失败」的经历而言，我们很难理解他为什么严厉指责过加拉太人以后，他自己竟然又受了雅各的影响，而到圣殿里按照旧约的「律法」去「献祭」。这岂不是要践踏基督的宝血吗？（来九章）难怪神不得不用祂全能的手断然加以阻止，让保罗被囚。不但拯救了保罗从他自己因为「人」的软弱而陷入的困境；也保持了神借着祂所释放有关基督救赎真理的纯洁。（参读恢复本使徒行传廿一章 26 节（注 1）；廿五章 11 节（注 1））

照样，当倪柝声在中共整肃的政治压力下因着人的影响而在真理上妥协时，神也容许他在监狱中度过他的晚年，因而保持了神借着他所释放关乎神永远旨意的纯真。这实在是神无限的怜悯，表现于祂智慧主宰的权能。无论对倪氏自己或对神的教会都是一件极大的事！它的意义恐怕只有到了永世我们才能完全领会！

死而复活

再者，关于倪氏在被囚期间肉身生活的表现的属灵意义，我们可以用宋尚节临终时一幅有关信徒「死而复活」的寓意图来理解。（参《灵历集光》附图四十二）宋氏在那幅寓意图里把信徒比作一个蚕蛹——一个丑陋的「虫」（参诗廿二6）。它借着吞吃桑叶丰富的供应（神的话）得以吐出光亮的蚕丝。

当它最终蜿蜒着「被囚」在蚕茧里时，它确实是一个满了腐败、满了瑕疵的虫！但是宋尚节指出：这一个丑陋的蚕蛹，一面是正在死亡，但另一面它也正在变化。最终它突破蚕壳、复活而出，蜕变成一个美丽的白蛾，向着无边的天空飞腾而去！

这个极富有属灵意义的比喻似乎就是呈现在我们眼前两个迥然不同的倪柝声影像的写照。当倪氏死在「山下铺」的幽谷中的时候，我们如果用高解析度的照相技术从天上把焦点集中在这一个六尺二高倪氏的残躯上，他岂不就像一个困在蚕茧中的死蛹？但是现在呢？倪柝声在全世界有心追求灵性进深的基督徒的眼中，却是一个破壳飞腾，遨游世界的白蛾！

这个白蛾就是神借着那个满有斑点、满有瑕疵的人所释放出来与祂永远旨意有关的神圣启示。故此，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不再是那个肉身的倪柝声，而是一个蜕变的倪柝声！「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罗十一33）我们怎能不敬拜神奇妙的作为！

最后，让我们来看这个蜕变的倪柝声对神普世教会的影响。当倪氏于一九五六年被判十五年徒刑而被囚于提篮桥这个犹如蚕茧一样的牢房时，就在那一年的冬季，一本名为《The Normal Christian Life》（中译：正常基督徒生活）的书在印度出版，编者是英国医生金弥耳（Angus I.Kinnear）。这一本书可以说是蜕变的倪柝声对全地教会传述他所受神圣启示的开始。迄今，此书已经翻成多种语言，而其销售量已经达到百万册以上。

同样奇妙的事也在他一九七二年过世后不久发生了！一九七三年，倪柝声病故的消息传到了全世界，同年，第一本倪柝声传记《Against the Tide: The Story of Watchman Nee》。（中译：中流砥柱）问世了（作者同是金弥耳医生）。因为这一本传记的影响，倪柝声的众多著作就更成为世界上爱主信徒中间极受欢迎的属灵读物。其中那一本论到《正常基督徒的教会生活》（原名《工作的再思》）如今在全球的信徒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回响。现在世界上已经出现了数千个的「地方教会」，且此影响正在日益扩大、继续增长。

甚至今日中国大陆家庭教会的蓬勃发展也直接与倪柝声的神学思想有密切之关系。这个呈现在众人脑海里蜕变之倪柝声影像和那个死在白茅岭幽谷中肉身之倪柝声影像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现在正是这一个破壳飞腾、蜕变的倪柝声，让神得着了完全的荣耀。

至于那个肉身的倪柝声，他绝对不是一个「完人」！但是因着神的恩典，他能以至死遵守神的「道」，没有弃绝主的「名」（参启三8）。他乃是「因信基督而死！」这岂不是神的怜悯！神的荣耀！

附录1 「我是怎样转过来的？」——倪柝声

这篇文章是倪柝声于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日的讲话，对象是在「上海基督徒聚会处」聚会的信徒，曾刊印在内部刊物《学习通讯》中。时值「抗美援朝」期间。政府发动在教会中「控诉帝国主义」运动。倪氏以见证方式说明他思想转变的过程，并承认他所持「超政治」观点的「错误」。他希望信徒们要和他一样「站在人民立场上」参加对「帝国主义」的「控诉」。笔者存有本文张锡康的手抄稿。其中如有抄写错误，可参对安那罕水流职事站（Living Stream Ministry）珍藏的铅印本。

最近的时候，我们觉得有的事情和我们已往所作的有一点不一样，有一点不习惯。事实上乃是由于我们的思想有问题。我今天不是要在这里批评，乃是要认罪。我承认我的思想也不清楚，乃是最近一个礼拜，因着几方面的事凑起来，我才初步的清楚了一点。所以今天我在这里和你们谈一谈。

我先作一点的见证，从北京会议之后，我回到上海，我里面起了一个很大的争执，或者说是起了一个极大的思想斗争，就是到底我们「超政治」可以不可以。这一件事在我身上觉得非常重，在这里有的姊妹与我同工三十年之久，也有人和我在一起二十几年。你们知道在这三十年中，我们完全传宗教，不摸任何其他的事，我们好像对于所有的事，都不感兴趣，只感觉宗教的事有兴趣。今天呢，好像三十年功夫中所有的一切，都起了摇动。我在北京听说「超政治」是错误的，这叫我非常为难，因为我没有认识「超政治」是错误的。我是心脏有病的，这一次心病又发，我在这么多年之中，经过了许多的事情，却从没有做过绝望的祷告，但是这一次我祷告，求主接我回去。

还有一个难处，就是最近的时候，联络员（请你们原谅我这样说，现在事情是已经过去了）特别提起应当控诉美帝国主义如何利用上海地方教会，我觉得要我起来这样控诉，是叫我撒谎。弟兄们，我实在是难过，我觉得我如果为要避免人的审判，而落到撒谎的地步，那是我作不到的事，所以我又有一次祷告：「主啊！求你接我回去！」弟兄们，我今天在这里和你们谈，乃是我在这几个月之中，翻天覆地的在那里翻出一些东西来。这几个基本的问题，叫我非常困难，困难到盼望早日离世。我想这几个基本难处，也许是今天晚上坐在这里我们一同学习事奉神的人所共有的。所以我觉得要把我自己转过来的情形和你们谈一下，让你们也在神面前看一看，到底这条路是不是这样走的。

一、「超政治」思想的错误

我的第一个难处，就是「超政治」到底是对，或者是不对的。我记得我还对刘良模先生说过，我觉得「超政治」有错误。但是，我今天晚上对刘先生说，我从前所说的「超政治」是错误的，还不彻底。这一次福州的控诉给我思想上一个很大的打击，郑证光弟兄说福州的教会受帝国主义毒害比接受帝国主义钱的人还要厉害。但是，我读他的话，心里有点疑问，可能有一点「过火」，因为他是年轻的人，可能写稿的时候，写过火了。岂知不然，有弟兄从福州来，从他口里知道汪佩真姊妹也是同样的看法。我有几夜功夫睡不好觉，一直在床上翻来覆去，觉得这里面可能有那一点是我没有看见的。福州的弟兄在那里说「超政治」是错误的。但是他们看见的经过，在我是认为不够的。我必须有更多更可靠的理由，我才能承认，我现在是转过来了，但是这也不是一下子来的。

这几个月中，一天一天都在那里增加，到了前一个礼拜四晚上，我才彻底明了这件事。我们以往以为信徒是能够「超政治」的。那天晚上我看见信徒是不能超政治的。一个人是自然而然的，不管你知道也好，你不知道也好，你觉得也好，你不觉得也好，总有某种政治的观点，你不能说你相信了耶稣，就没有政治的观点。

我在北京的时候，曾替有的外国人抱不平。虽然我三十年来是排外的。但是，我还得承认，有的外国人，的的确确是爱主的，是来传福音救人的，不能一笔抹煞说：他们都是帝国主义份子。到了礼拜四晚上，我转过来了，我想恐怕不是帝国主义份子的外国人很难找。我记起一件事：我看见一个西国教士，按着我们的标准来看，他是一个很好的信徒，他是一个爱主的人，他是一个传福音希望人得救的人。从前他在上海看见有英国的员警，三道头，看见有工部局，看见了治外法权，看见有外国兵，诸如此类的事情，他都看见了。有一件非常稀奇的事，就是他没有感觉，好像他觉得这些事是不必大惊小怪的，是自然而然的，是没有疑问的，或者说得再重一点，是天经地义的，是应当如此的。对于这些事，他连一个疑问都不打。

我礼拜四晚上想到这件事，我就对我自己说，宗教信仰是一件事，政治观点又是另外一件事。在这里有一个人，他的政治观点，的的确确是帝国主义的观点。如果我到了伦敦，看见中国人不必受英国的员警的管理，要怎么作，就可以怎么作，甚至可以武装起来，我要感觉稀奇。我马上就看见，信仰是一件事，政治的观点，又是一件事。有许多人信仰是纯正的，但是政治观点是帝国主义。

我礼拜四晚上也记得我在印度所遇见的事。我应印度圣多马教会之请，向他们的工作人员讲道。圣多马教会是多马传去的，全体是印度人，他们比天主教还要早。有一些英国教士也来旁边听。有一天，一个英国传教士问我说：「倪先生，你看差会的工作在印度怎样？」我说：「不能发展。」他就问：「为什么？」我说：「总得英国政府退出印度，你们这些英国教士也退出印度，教会才会有办法。」

他就问说：「为什么缘故？」我说：「你们在这里，印度人不能分辨你们是英国人呢或者是基督徒？」他们听见这些话很不乐意，其中有一位管理教士公所的姊妹，她瞪着眼睛，一直看着我很久很久。她说：「你的意思是说英国人在印度是错的吗？」你们看，人能够是一个信仰纯正的人，但是对于印度人的要求能够麻木不仁，一点感觉都没有。她的政治观点是帝国主义的。

二、你所配上的是什么？

礼拜四晚上我就想到这一个：「一个人可能在宗教上是纯正的，而在政治上是帝国主义份子，我发现信仰是一件事，政治观点又是一件事。我就问我自己，今天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连我在内，到底除了信仰之外，我们的政治观点是什么？只有两个可能：你不亲帝就得反帝，你不反帝就是亲帝。你不配上人民的立场，你就是配上反人民的立场，换一句话说，人不能『超政治』。」

尽管你说「超政治」，自然而然有一个政治观点托住你，像一个茶杯，有一个盘子托着一样。这个杯子是宗教，但是你的盘子是什么盘子？那时我就恍然大悟，政府不是要问你的杯子如何，乃是要问你的盘子如何。政府不管你的宗教信仰如何，不管你的宗教是长的、是方的，政府所要管的，是你所配上的盘子，是什么盘子，你的政治立场是什么立场，你是反帝的基督徒呢？或是反人民的基督徒呢？你到底是哪一种的基督徒呢？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这不是问题。

今天人民的问题，不是你是不是基督徒，他们老早知道你是基督徒，问题是你的政治观点是什么。你是帝国主义的基督徒，或者你是反帝的基督徒？总得划出界线来，表明出一个立场来。前礼拜二，周处长至这里讲话，当他说到只有一个立场的时候，我的确受了很深刻的启发。今天人民对我们的要求，就是盼望我们能够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思想说，从人民的立场来和宗教结合。今天所有的问题是到底你所结合的政治立场是什么立场。

我今天不敢说我十分清楚了，不过我觉得我是过了一个阶段。我觉得我自己以往不对，以往我的态度是我们信主的人是「超政治」，今天我对你们说，这是不可能的。在我们的脑子里是超的，但是在事实上是不超的。说出来也好，不说出来也好，我们总有一个政治观点，如果不是反帝就是反人民。

三、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看

我们总得有一个机会来表示我们政治的立场。政治的问题，如果以宗教的角度来看，就不清楚。我们站在政治的立场上，人民的立场上，就完全清楚。我刚才已经说过，那个西教士，在宗教的范围里，我们说他是看见，但是你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反帝的立场上，你要这么说：他在宗教上是一个弟兄，但是他在政治上的的确确是一个帝国主义份子，他的政治立场是帝国主义的立场，他的政治态度是帝国主义态度。

所以我们要分开宗教和政治来看，我们必须分的清楚，在宗教上的观点，不能拖到政治的观点来，你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时候，你自然看见有许多的事情，许多的人，以往我们认为对的今天要以为错了。

就如我们的「三自」，从宗教的观点上来看，我们的的确确已经「三自」三十年了，但是从政治的立场上看，我们的「三自」，连一天都没有起头。我们以往并没有坚决的站在反帝的立场上。我们的「三自」也就和政治上反帝爱国的三自不一样。

弟兄姊妹，盼望我们今天晚上，把我们已往所以为已经做得很好的，归至宗教的范围里。今天政府也好，人民也好，是要问我们在政治的观点上，人民的立场上，到底做了什么事？我们承认我们一点都没有做。

四、在亚当里和在基督里

也许需要引一个比喻。在神学上，我们知道人有两个范围，一个叫做在基督里，一个叫作在亚当里。在基督里的人，是得救的，在亚当里的人，是不得救的。在亚当里的人都不好吗？不是的，我们知道在亚当里的，有的人道德很好，学问很好，爱心很大。有的人很忍耐，很慈爱。

按我们宗教上的道理来说，这样的人得救不得救？我们都摇头说，不得救。是因为他做得不好吗？不是的，是因为他在亚当里，没有接受过基督复活的生命和圣灵，管他做的多好，都不中用。要在基督里的才有用，在亚当里的没有用。在亚当里和在基督里，在我们乃是一个最普通的道理。

现在我问你们一句话，我们就算是有长处，到底我们的长处是在什么范围里？我们所有的长处都不过是在宗教的范围里。在政治的立场上，我们什么也没有做。我们说我们和外国人斗争了三十年，我（们有的）是被老公会革除出来的，我（们有的）是被老公会辞退教书职业的、护士职业的，怎么

说我们受了帝国主义的影响？请你们记得我们所做的是这么多，的的确确做的很多，但都在宗教范围内的，并不是在政治范围内的。犹如在亚当里所做的，在基督里都算不进去。

我们和外国人的那些斗争，完全是宗教的，不是政治的，根本不能算。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都有这个经验，一面我们看在亚当里所有的罪是罪，另一面也定亚当里所有的义为罪。我们在亚当里所做的一切好处都不算，今天人民对于你们也有同样的要求。你们在宗教里所做的不算，只有在政治里所做的才算，你们必须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才算。你们在宗教上所做的不要提，你们不要说你们宗教方面的长处。

所有的控诉乃是在政治上，人民的立场上来看你们已往是如何的。到底你以往是站在人民的一边呢，或者是站在反人民的一边？是站在反帝国主义的一边呢，或者是站在帝国主义的一边？这一个问题没有解决，而把宗教范围里的东西拖到政治里来，就什么都糊涂了。

弟兄姊妹们，我在这里有一个要求，我盼望你们在主面前，要花一点功夫，有一点思想，有一点祷告，求主给你们看见，人民的立场是另外一个东西，是政治上的观点，是政治上的思想，我们以往只注意属灵的事，我们没有注意要站在反帝的立场上，人民的立场上。

五、只有一个立场

我以往还有一个错误，我以为有两个立场：一个是宗教的立场，一个是人民的立场。但事实是只有一个立场，没有二个立场。从政治的眼光来看，只有人民的立场，绝对不承认有政治的立场和宗教的立场的对立，从政治的眼光来看，我不过是一个人民，相信基督而已；或者他是一个人民，不相信基督而已。

在这里有一个人相信基督，有一个人不相信基督，大家都是人民，不过有的有信仰，有的没有信仰而已。并不是有一个人民的立场，再有一个宗教的立场。只有一个立场，就是人民的立场。今天我觉得做人民很简单，我们就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做基督徒。换一句话说，你上面的茶杯是圆的也好，是方的也好，只有一个是要紧的，就是你这个盘子要弄好，你的政治立场要对。

前礼拜二你们听见周处长讲帝国主义在那里利用圣经，帝国主义在那里利用灵性的生活，帝国主义在那里利用传福音的热忱，有的弟兄姊妹听了，就发生难处，好像这是摸到宗教本身来了。圣经，灵性的生活，传福音等都被利用了，那到底信仰自由不自由呢？可是你们如果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能够看见帝国主义什么都会利用。

从我们基督徒角度来看，有许多东西是神圣的，圣经是神圣的，祷告是神圣的。从帝国主义的眼光来看，没有一样是神圣的。任何东西能够达到它目的都可以利用。在帝国主义的眼睛里，没有一样神圣的东西，只要能达到目的就要利用。所以从宗教上来看，你们觉得难受，怎么利用这一个，利用那一个？

慢慢的，请问，你的立场站稳了没有？你如果是一个反帝的基督徒，你读圣经，它没有法子利用。你如果光是一个基督徒，而不是反帝的，你读圣经就很可能给它利用。所有的问题：是你是不是一个反帝的基督徒，你如果是一个反帝的基督徒，属灵没有关系，我礼拜五和周处长谈的时候，他就说这句话。你们政治的立场站稳了，你们只管属灵，无所谓。不知道自己的立场的人就有问题，你们如果

不是积极的反帝，帝国主义就可以利用你的祷告，利用你的读圣经，利用你的属灵的生活。

你们千万不要误会政府反对我们属灵的生活，反对我们宗教的热忱，问题乃是在乎没有正当的政治观点的那个宗教生活，是帝国主义所能利用的。你一反帝，它就没有法子利用，今天的问题不是杯子里是什么东西，今天的问题是你的盘子是什么盘子？是反帝的或者不是反帝的。所以你们必须有反帝的立场，有人民的立场。

附录 2 倪氏同监犯陶珠莉单纯信心的能力

作为一个信徒劳改犯，陶珠莉经历了单纯信心的能力，使她能够忍受劳改生涯中似乎难以忍受的煎熬。最终她不但得到平反，并蒙神手奇妙安排来到美国与亲属团聚，并继续忠心事奉主。

陶生于一九三七年，并于一九五〇年左右在上海基督徒聚会处蒙恩得救。她参加儿童聚会的「清心班」（那时根据圣经将儿童编入「清心」、「慕义」等班）接受何广明的带领。陶在幼年即认识基督作她生命救主，学习听从她里头「小声音」。她在上海震旦女中读书时任校内宣传部部长并兼黑板报的主编。一九五四年毕业后入南通医学院（二年后迁苏州改为「苏州医学院」）。一九五六年肃清反革命运动中被捕，校方逼她揭发「倪柝声」反革命罪行。

最坏的记忆·最好的希望

但她坚称倪是传道人，与反革无关。次年「大鸣大放」期间，她写大字报批评中共，以主编身份写了名为「最坏的记忆，最好的希望」大字报。意指她在肃反时无辜被捕为她「最坏的记忆」；但现在对政府接受人民批评抱有「最好的希望」！

不久毛泽东发动「反右斗争」。她被校方审问，要调查还有何人与她同党反对政府？她不肯牵累别人，一口承认「这一切都是我一人所作」。虽然学业已经完成，竟被校方开除。被遣送到青海西宁近郊被服劳改厂接受「劳动教育」（劳教）。

一九五九年，她被遣回在上海，安排在「地段医院」作医生，但她的身份仍然是「摘帽右派」。一九六八年张愚之刑满从浙江老家返回上海，继续带领家庭聚会查考启示录有关教会的预言（启示录一至三章）。陶自愿替张抄录讲义。其前她曾到陆道雄家看小孩，因此和陆认识。文革爆发后，张愚之和陆道雄相继被捕，而陶也被牵连而被打成「极右派份子」。她被捕后在提篮桥的劳改生涯已如前述。

梦中电梯

「四人帮」倒台后，邓小平改革政策开始。陶申请「平反」立即获准，在申请平反期间，陶曾作一异梦。她梦见她小姨到她工作的医院去看她。她就抱着她的儿子陶陶上了电梯（她被关时儿子才十四个月大）。这个电梯的结构非常奇怪。电梯的四壁都是透明的玻璃。那时中国还很落后，根本没有这样的电梯。

陶写信将梦境告诉她母亲，她母亲说：「这个梦大概是神要带领你离开。」当时她并不晓得「离开」是什么意思。她对笔者说：「我于一九八〇年到了美国达拉斯移民局去办手续的时候，竟然发现那里的

电梯，和我梦中所见的完全一样。常言：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但是那个时候，中国大陆从来没有这种电梯，我怎么能够想到它呢？」事情就是如此发展开来：第一步神带她离开农场；第二步神带她离开中国到美国。

她对这个奇迹式的经历的记忆是这样：

「有一天一个像中国本地学生装束的青年人，上身穿着 T 恤衫，脚穿球鞋忽然来到我们家里。那天正好我没上班，经过他自我介绍才知道，他是受我美国小姨的托付来看我。我才知道他是从美国来的。就随口问他我们有没有往美国去的可能？他当时并没有说可以不可以，我们也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不久以后，我们忽然接到从美国德州一个小城寄来的一封短信。内容只有几句话，大意是：『我知道你们的情况，我可以替你们作经济担保，我不知道我怎样继续帮助你』。信的末了是一个署名乔治卡本特（George Carpenter）的美国人。」

陶珠莉长期在监狱和农场生活，连中国话都不太会说了，英文更是不行。她母亲鼓励她去向公安局申请护照，结果很快就把护照发下来了。同时也接到了美国一个教会大学入学许可（I-20）。她的父亲英文很好，是烟台长老会著名的「益文商专」毕业的。他帮陶写好了几句简短的英文句子让她背熟。譬如：My name is Julia, I go to America.（我的名字叫珠莉。我要到美国）等等。

那时候她还担心她的小陶陶怎么办。她从孩子生下来已经有十一年没有在一起了，自然希望小孩也能得到签证。一般这是很难得到批准的，但是她心里似乎感觉神听了她的祷告。她去美国领事馆签证时，首先对领事说：「My name is Julia, I go to America to study.」

她对笔者说：「那时我也想和领事说，我希望带孩子一起去，但是因为有个中国翻译站在旁边，我就不敢说。那时我心里迫切祷告，求主给我机会。我刚刚祷告完了，电话铃突然响起来。我就趁中国翻译去接听电话的时候，从嘴里蹦出来两句背好的不合文法的英文：『I'm out of Jail because I'm Christian, I need to take my son with me.』（我是基督徒，我从监狱里出来，我必须带我的儿子一起去。）

「领事马上说：『OK!OK! I got it, I got it.』（好！好！我懂了，我懂了！）等那个中国翻译一回来，领事就对他说：『This one F-1(指我：这个是学生签证)，『This one F-2（指着我小孩：这个是随亲签证）。』

「我当时也不懂？F-2 是什么意思。这里我看到人的软弱，也看到神的大能。我在农场一直求死、一直祷告主接我去吧！但是主仍然留我到今天。这时我对儿子的签证毫无把握，也不知道我到美国怎样生活、怎样养活我的儿子？我离开上海的时候，身上只有四十块美金。一九八〇年，我们的飞机离开了上海虹桥机场以后，我在太平洋上空从飞机的小视窗眺望我生长的家乡，我所热爱的中国，直到它从我的眼帘上逐渐消失。」

陶珠莉现在定居在德州的一个小城镇，继续事奉主，为主作见证。

附录 3 倪氏同监犯吴友琦受洗归主

吴友琦于一九八〇年从白茅岭农场释放出来。那时他还没有信主。他凭着自己的努力考进上海外文书籍进出口公司任职。因他做事认真，最终被提升为总经理的助理，负责向全国各大学和文化机构推销进口外文书籍。同时他和倪妻张品蕙的亲戚保持往来，包括品蕙外甥女鲍贤玲和品蕙六叔张汝励

和其子女。此外他也和倪栢声二弟倪怀祖夫妇保持友好关系。

在他工作期间，他和妻子周成玺都在上海「新恩堂」受浸（该堂位于北乌鲁木齐路，原为内地会名牧杨绍堂牧会之地）。他经常参加那里「上海聚会处」信徒们的聚会。这个聚会虽然已经向政府登记，但不在「三自会」控制之下。为了顾到他们聚会的传统，他们也被准许与「三自会」分开聚会。参加三自会的信徒礼拜日早晨在「新恩堂」举行崇拜。而「聚会处」的信徒在礼拜日下午「借用」新恩堂举行「讲道」和「擘饼」聚会。目前聚会人数约二百人。会众里包括和受恩教士（Magaret Emma Barber）、第一个中国同工李国清的大女儿李沐才和她妹妹（二人都已九十岁以上，接近百岁）。聚会形式和所用《诗歌》都和一九四九年前无大差异。

吴友琦于主后二〇〇〇年从公司退休，本想和他那为他受苦二十年忠心的妻子周成玺共用晚年，但是她到医院检查时发现患有直肠癌。并且已经恶化到末期。医生告诉他准备料理后事。吴友琦在医院嚎啕大哭，痛不欲生。明知没有治好希望，他仍然向亲友借钱购买昂贵进口抗癌药品，负债人民币近十八万之多，最终她的妻子不治而死。

他的儿子吴晓龙幼年时，曾陪同母亲到白茅岭农场探望父亲，暑期有时就住在吴友琦的宿舍里。当吴出工劳动时，晓龙在宿舍作功课，陪伴病重孤单的倪栢声。倪氏对晓龙非常喜欢，为他补习功课，并特别关心他的健康。当晓龙在野地上大便以后，倪就拄着雨伞（当拐杖）到外面检验他的大便，观其颜色，加以分析，然后对他应吃的食物提供建议。晓龙称倪为「福建阿爹」（因为上海人只称自己的爷爷为「阿爹」，故加「福建」来区别）。

吴友琦虽然在劳改期间没有因倪氏信主，但他对倪的学识和惊人的记忆力，敬佩之至，尊称倪为「倪伯伯」。吴友琦信主后，对圣经研读甚勤，并且每主日都到新恩堂聚会。擘饼聚会上，他常常点诗让大家唱。吴友琦现在已经来到美国，并和一个在安那罕水流职事站任职的美国姊妹结婚。

附录 4 倪妻张品蕙的「平反」书

（一）沪公政保（4）字第 652 号

上海市公安局

决定书

张品蕙，女，1902 年生，福建省福州市人，无业，原住岳阳路 200 弄 88 号。1971 年 11 月病故。

1969 年 2 月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以张“思想反动，利用宗教进行反革命活动”等罪行。决定给张戴上反革命份子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

经复查原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给张品蕙戴上反革命份子帽子的决定不当，应予纠正。

据此，撤销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62）沪军审（戴）字第 43 号的决定。予以平反。

上海市公安局

1986年8月23日

- 倪妻张品蕙去世十五年后之「平反」书。（原件存吴馨处）

附录5 倪妻张品蕙临终前的亲笔信

兴道您好！

我一直病到现在。26日傍晚我从梯子跌下经X光片子拍，断第9第10肋骨，这两天比较好点。因血压高，心脏病，不能贴膏药，也不能吃中药，又不能用橡皮膏固定骨头，经商量之后医生就替我用封闭疗法，但断骨当空非常之痛，两天后医生就替我用胶布缚好，所以舒服能站住。您最近一切都好吗？

我大姊及孙女27号抵上海，所以我此次病她们帮我忙，因我睡下就不能起床，她们扶我起床。她们是从北京来的。

述叔病在广德，上月19号及26日两封信寄我去广德，当然是通过领导，但我要求骨接好再说。

这些天这里对疏散已不提，所以我想麻烦你把我行李可以托运来，我若去广德就需要被褥及棉袄等。这件非常麻烦你，我只有心感，祂也会祝福你。替我挑到托运公司的人多给他们钱，因很重。款若不够，请先垫，我当寄还。就运箱子及铺盖（塑胶包）

一切至感至谢。祝安好。

娟匆上

4日

- 张品蕙于1971年11月4日致马兴道（即马兴涛）信，「述叔」指倪述祖（倪栢声）。此信中所写「行李」乃是因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后，毛泽东呼吁城市居民疏散到乡村去。

附录6 倪氏临终前致张品琤、马兴涛亲笔信

以下附录全是倪栢声临终前半年给他亲属的亲笔信。信中「大姨」指张品琤，她是倪妻张品蕙的大姐。鲍贤玲是品蕙二姐张品芳的长女（品芳嫁给鲍国梁）。鲍贤玲嫁给万绍祖；万小玲是她长女。倪妻张品蕙去世前一直住在岳阳路鲍贤玲家里。马兴涛（原名兴道）是倪栢声堂兄倪承祖的女婿。倪栢声「大姊」倪闰臣嫁给陈献章（陈终道牧师是她儿子）。她家住香港，定期汇款给倪栢声，由他妻子张品蕙代收。本书倪氏夫妇亲笔信均由其弟妇倪兴祖夫人徐恩秀提供。

品琤大姨，贤玲甥女：

在此听说，上海有公墓代为保藏骨灰，请为纳费托管，如果有朝一日我能来沪一行，再行处理，如无托管地方，则藏在家里，至托至托。

照片放大放反了，请照正面再放大二张寄来，还有房间照片，令孙女说，还有二张照片，能好能找到相馆请共将四姨一人放大寄来，并托买一个能安插这些相片的皮夹。

四姨临终要我吃“复方磷酸脂酶”，请设法为我买三个月药量。

四姨的新的东西我全不要，我所要的是她最后用过的绒衣、裤、头巾、蒙头、旧袜子、手帕、牙刷以及其他小件的纪念品。

请带我购一皮制裤带，越简单越好，橡皮膏一卷（约二分阔的那一种），“可的松软膏”十管（不要“强的松”的），热皮袋一只，搗胃痛用。

一切谢谢，大姊寄家用，原用的是张品蕙图章，现在是否要用我的图章，请查家中有否我的旧图章，如无，请即来信，我当立即寄上我的图章一枚。

祝你们好

倪傲夫白

十二月十六日

• 1971年12月6日，倪柝声致张品琤、鲍贤玲信。「大姊」系指倪大姊倪闰臣（陈献章妻），时居香港。

品琤大姨：

贤玲外甥：

东西已经收到，至为感谢，图章要否寄来？

四姨去世，我要一些纪念品，以志永好，寄来东西，我要她最近穿的但旧的鞋子二双，及她寄的旧的穿过的内绒布的衣裤，请你替我寻出，至为感激，千万寻出。

我有一件大棉袄，但因没有罩衣，不能穿它，衣身是三尺二寸，袖子是三尺二分，腰身是一尺五寸五分，请买不论好坏，不论颜色，只要十分耐磨，能穿长久的布做一件罩衫，手肘处请加双重。

我需要一只坐垫，尺寸是约1尺×8寸×2寸，内用塑胶泡沫，外用又耐磨，又易干的深色布做，并做一手提。

四姨的病历卡千万要寻求，死亡证请也寄来。

照片正面的请放大二张，四寸的放大一张，孙女说还有二张和别人同照的全身照片二张，最好设法找到底片放大二张寄来。

我在这里身体不太好，但我并不急切。

祝你喜乐

述祖

一月九日

• 1971年1月9日倪柝声致张品琤、鲍贤玲信

品琤大姨：

明日是蕙妹逝世半周年之期（五月七日），这半年来，变化实在太大，回首前尘，展抚遗物，叫我不能不一直心感悲痛，二十年来，不能一次伺候她，总是终身遗憾，一切都是我对她不起，害她困难，我病已缠绵，经常反复，生活我尽量简单化，以免麻烦人家，病中实在想念自己的亲属，想要和他们一起，但我顺服环境安排，十余日来深思蕙妹不能自己。

你身体如何？时常在挂念之中，年老的人只有多加保重，你还想南边来，不想？我不知道如何说才好。

我只有祝你好

述祖

五月六日

收到你27日的信，至谢

你如能来，多见自己的人一面，实在是好的，我用的东西都不缺，只有手电筒坏了，药品你已知道，其他没有什么需要，此间山明水秀，望你这次能多住一点时间，不要匆匆而去，望你在此能休息一个时期，不过要带一个人陪你，不然就很不便。

六叔汝励在解放前后，都对我思想有帮助，不知他的地址在哪里，还要兴涛侄婿的地址。

服药以后没有再恶化下去。

述祖

六日

（“消炎止痛膏”十几包，复方可的松软膏十几盒，蕙妹旧皮鞋。）

• 1972年5月6日倪柝声致张品琤的二封信。信中「蕙妹」指其妻子张品蕙。

品琤大姨：

你六日北京的信及十一日上海的信，均已收到，你此次来，望能多住一点时间，多休息一点，我病中想能与自己的亲人多接触，此间山明水秀，有一特点，孩子长得特别好，比上海从前所看到的都好，望多见一回。

蕙妹骨灰，的确是个问题，你来后再商量定。

我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手电筒带一个来。

祝你好

述祖

五月十六日

• 1972年5月16日倪柝声致张品琤信

兴涛侄婿：

我的情况，我想婶婶在世之日，一定对你谈。

你知道我是有大姨寄家用的，所以生活没有问题，我年老病多，极想到自己的亲人那里去，落叶归根可以寻个归宿之处，我迫切希望，你能替我负责办妥这件事情，一切方面全倚靠你。

婶母去世至今六个月半，我五内俱摧，过日为难，我希望你勉力为之，将证件寄到此处，婶母在日多次提到慧宜及其孩子，不知孩子们现在如何？念。

听说到浙江去，粮票有问题，我想，我吃很少，有解决方法，不要紧。

廿多年未通信，常在念中。

祝你好

述祖白

五月廿二日

• 1972年5月22日倪柝声致侄女婿马兴涛信。

品琤大姨：

我和领导谈过，关于我的出场问题，他说：“北京、上海不能去，要去小的地方，农村。只要有证明来，政府要按政策办事，不必我…谈”。

所以请你代我在亲戚中找可以代为挂钩的人，可以向其说明，我有生活，希望他收留我，请公社证明我可到他地方，可收纳我。

希望能在亲戚中替我找人，马兴涛也是可以商量的一人，请你和他商量，或者别人。

拜六夜里又发一次好几小时的心房颤动，后来吃了地戈辛，人能支持，礼拜睡一整天，我在病中心情极想回到自己亲人在一起，落叶归根，我和大家二十年失了联系，只好请你。

你来时带一斤太仓肉松，一斤牛肉干，我因心肌梗死，医生说：不可吃蛋黄、肥肉各种腑脏，以免加剧，故只好吃点瘦的，不吃，又缺少蛋白质的氨基酸补充，很困难。

祝你好

述祖

廿二日

家中有《联共（布）党史》，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请由邮寄来。

• 1972年5月22日倪柝声致张品琤信。请代找可以「挂勾的人」（建立关系之意），及愿接纳他居住的人，不然他不能刑满离开农场。

品琤大姨：

我将于明早调离枫树岭到山下坡农场去，你来的时候不要买票到枫树岭，要买票到山下坡下车，比枫树岭再远一点点，进去第二站我曾蒙发一信给你，比这封早，不知收到没有，望早见面。

祝你好

述祖

五月廿五日

• 1972年5月25日倪柝声致张品琤信

兴涛：

我在枫树岭时，曾写给你一信，望你能替我办到公社的一张证明书，说明你们愿意收纳我，保证我的生活，（你知道我有大姨寄家用）你们态度要明朗……

我于今日从枫树岭调至白云修养组，望你努力而为，给我一封回信，证明要直接寄给白云山农场第十四队，抬头是由公社写给安徽广德县白茅岭农场，但是你寄来时要寄到安徽广德县白云山农场第十四队收。

我极望回到自己亲人那里去，请您努力。

祝你好

述祖白

五月廿六日

• 1972年5月26日倪柝声致马兴涛信。此信的字迹显明倪柝声写信时手有颤抖现象，这是他当日调离枫树岭到了「白云山」（即山下坡）后，立即写给马兴涛的信。他表明「极望回到自己亲人那里去。」

品琤大姨：

我调到山下坡十四队，这里离开车站还有十里路，还要翻一座山，你来实在不便当，可以不必来了。

我病中心仍喜乐，请你不必挂心，我仍尽力促使自己，不要因病痛难过。

品蕙骨灰请你处理，一切都拜托你，我都同意。
纸短情长，祝你好

述祖白
五月卅日

- 倪柝声于 1972 年 5 月 30 日致张品琤最后的一封信。他于隔日凌晨二时去世。